

# 史大奈生平事蹟研究\*

朱振宏\*\*

## 摘要

史大奈是隋末唐初一重要的突厥族蕃將，李淵太原起兵之際，最早歸附李淵旗下的外族即是史大奈，而突厥族入唐後以「史」為姓，也是始自史大奈。然而，傳統史籍文獻關於史大奈的出身載記缺略不明，對於史大奈歸附李淵的背景也不甚清楚。敦煌文書 S.2078 Verso 習字保留史大奈神道碑的部分內容，使我們可以對史大奈世系及其生平事蹟有更多的認識，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關鍵詞：**敦煌寫本、S.2078 Verso、史大奈、突厥、隋唐

---

\* 本文係科技部專題計畫：「隋唐時代突厥人漢文墓誌考釋及綜述（III）（計畫編號：MOST 103-2410-H-194-017）」之部分研究成果。本文初以〈敦煌寫本 S.2078 號習字文「史大奈碑」再研究〉為題，宣讀於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朝陽科技大學通識學院、財團法人松山教育事務基金會主辦「2014 碑誌、文獻與考古國際學術研討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144 國際會議廳，2014 年 12 月 27-28 日）。今復承學報兩位匿名審查人細心審閱，並惠賜諸多寶貴修改意見，受教良多，特申謝忱。

\*\*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引 言

「史大奈碑」習字文見於敦煌寫本 S.2078 Verso，原件高 31 公分，寬 436.78 公分，現藏於英國國家圖書館（British Library）。S.2078 Verso 除習字外，尚有社人張員住身故轉帖抄、《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寶雲經卷第七》、《寶雲經》等內容，從筆跡判斷應為同一人所書寫，此文書的錄文收錄於郝春文教授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十卷。<sup>1</sup>游自勇教授曾對 S.2078 Verso 習字的內容進行釋錄整理，指出從內容來看，碑主突厥族裔，姓名已佚，生年不詳，卒於戊戌年，即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隋時入侍隋煬帝，突厥內亂留隋，曾參與遼東之役。後隨唐高祖舉義，討平汧隴，封康國公，授右翊衛將軍。經與史籍比定，可以確認碑主是史大奈。<sup>2</sup>其後，游自勇教授、趙洋先生分別從復原考釋、知識傳播等不同視角對「史大奈碑」習字進行論述，<sup>3</sup>並以此撰寫完成〈敦煌寫本 S.2078V「史大奈碑」習字之研究〉一文。<sup>4</sup>

S.2078 Verso 習字部分共有五十四行，並未完整抄錄「史大

---

<sup>1</sup> 郝春文、周尚兵、陳于柱、聶志軍、王曉燕、杜立暉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第十卷，頁348-353。

<sup>2</sup> 郝春文、周尚兵、陳于柱、聶志軍、王曉燕、杜立暉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十卷，頁352。

<sup>3</sup> 游自勇教授2013年11月16-17日於國立成功大學主辦「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敦煌寫本「史大奈碑」的復原與考釋〉，對於S.2078V「習字（史大奈碑）」的錄文、復原進行考訂修正，同時對史大奈世系、入隋入唐後的經歷等問題進行研究。趙洋先生2014年9月13日在武漢大學召開「新史料·新史學：武大首屆歷史學博士論壇」宣讀論文〈敦煌地區的知識傳播與接受——以「史大奈碑」習字為例〉，指出史大奈碑文傳至敦煌後，由於其對大唐帝國忠義之形象在歸義軍政權時期受到歡迎，碑文內容遂成為當地寺學教育的習字範本而得以被反復抄錄傳播。

<sup>4</sup> 游自勇、趙洋結合〈敦煌寫本「史大奈碑」的復原與考釋〉、〈敦煌地區的知識傳播與接受——以「史大奈碑」習字為例〉等兩文內容，改寫成〈敦煌寫本 S.2078V「史大奈碑」習字之研究〉一文，分別提交宣讀於2014年9月6-8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舉辦 Prospects for the Study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The Next 20 Years 以及2014年10月17日首都師範大學主辦「棠棣之華：第二屆首師大——復旦中古史青年學交流會」等學術會議。該文最後刊登於《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30輯，頁165-181。

奈碑」全文，習字的內容既有單字重複，也有段落重複。以常理而言，習字文雖是隨手所書，但仍會因循原範本「史大奈碑」文字順序成段抄寫，相隔較遠的文字出現串列的可能性不大，史大奈碑的文字復原應儘量遵從習字的順序。又有些文字有著固定搭配，故部分文字雖改變原有的順序，復原文字的修訂也可按此原則進行調整。此外，因習字是依據範本抄錄，不會憑空出現無關的文字，所以某些重複文字可作衍字處理。從習字最終兩次均抄至「陪衛」便戛然而止，推測很可能作為範本的碑文原來就是殘缺不全，據此碑文起首部分可能也已缺略。習字抄錄的起始部分雖不是一篇完整碑文開頭，碑主的名諱也信息缺失，然而透過碑文所記內容與兩《唐書》有關史大奈事蹟校勘比對，有著高度相合之處，由此可以推斷習字所抄錄的碑主就是史大奈。<sup>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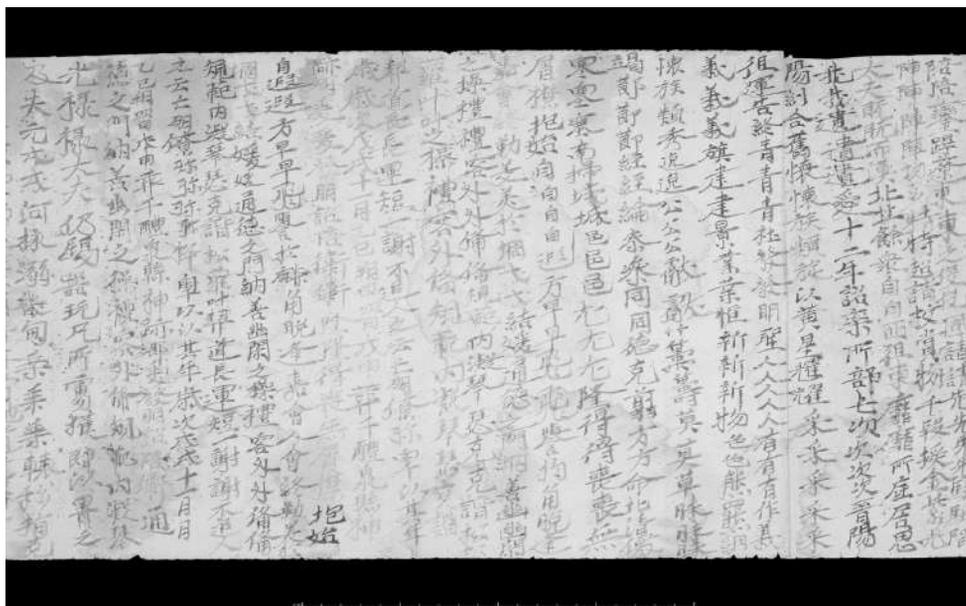
雖然游自勇教授與趙洋先生已釋錄 S.2078 Verso 習字並從習字內容探討史大奈的生平事蹟，得出許多高見，然而仍有部分觀點尚未闡釋說明，例如史大奈成為西突厥的特勤，並隨泥撅處羅可汗達漫一同入隋原因、史大奈歸附李淵過程等；此外，游、趙兩先生對於《元和姓纂·河南史氏》記載的「康國公」、史大奈卒逝時間等見解，也或容有商榷之處。因此，本文以游自勇教授的釋錄整理以及研究成果為基礎，參照原件圖版，<sup>6</sup>對習字的錄文進行釋讀校訂，同時透過習字內容，結合傳統史籍文獻以及近年新出土墓誌，探討史大奈世系、入居中原後的仕宦生活、史大奈卒逝時間及歸葬地等問題。<sup>7</sup>

<sup>5</sup> 郝春文、周尚兵、陳于柱、聶志軍、王曉燕、杜立暉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十卷，頁352，游自勇、趙洋，〈敦煌寫本 S.2078V「史大奈碑」習字之研究〉，頁165-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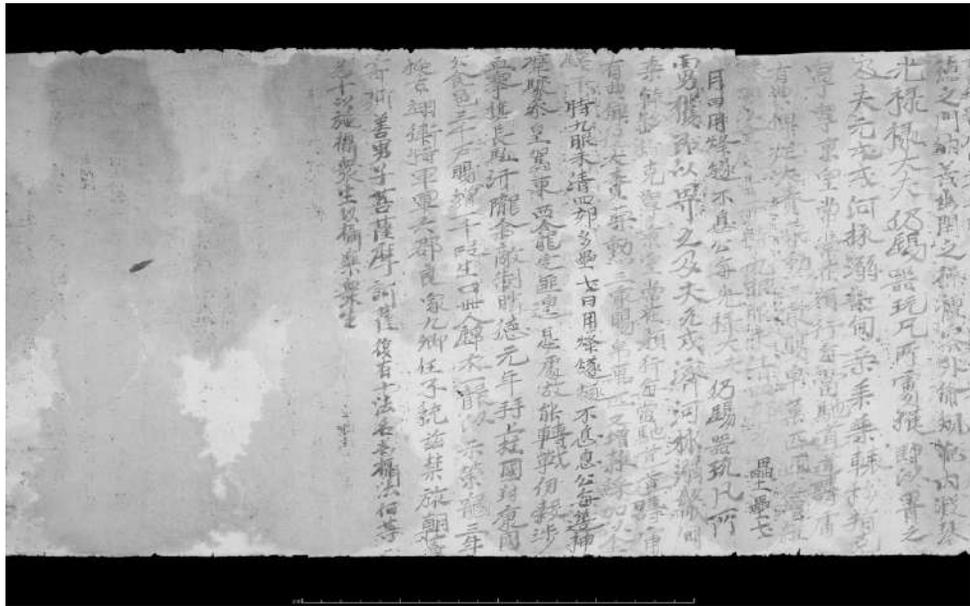
<sup>6</sup> 原件圖版引自「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網站：<http://idp.bl.uk/>。圖錄亦可參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第三卷（斯一三八六一—二〇八一），頁284-285。

<sup>7</sup> 本文藉由 S.2078 Verso 習字內容，結合傳統文獻及近年新出土墓誌，重新檢視史大奈世系，並探討史大奈入居中原後的生平事蹟、卒逝時間及歸葬地等問題，關於史大奈碑以習字文本形態在敦煌地區的傳播過程，則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





- 21 陽糾合舊懷懷族類旋以黃星耀耀采采采
- 22 徂運告終青青社發發明聖人人人人有有有作義
- 23 義義義旗建建景業業惟新新新物物色色色熊羆網
- 24 懷族類秀逸逸公公公獻獻竹竹籌籌莫莫草草味味味
- 25 竭節節節經經綸參參同同德克克剪剪方方命北清傲
- 26 寒塞塞南南掃域城邑邑尤尤尤隆隆得得喪喪無
- 27 屑襟襟抱始自自自自遐方早早早飛飛響於角晚逢
- 28 嘉會會終勒美美於珣戈戈結媛媛通德之門納善善幽閑
- 29 之操禮禮容外外外備備規範內凝琴瑟瑟克諧松松
- 30 蘿蘿叶叶之操禮禮容外外外備備規範內凝琴瑟瑟克諧
- 31 契道道長長運短一謝不追人之云亡朋僚殄粵以其年
- 32 歲歲次次戊戌十一月乙巳朔四四日戊申葬于醴泉縣神
- 33 跡鄉爰爰發明詔陪衛衛隆隆得喪無屑襟襟抱始
- 34 自遐遐方早早早飛響於麟角晚逢嘉會會會終勒美美於
- 35 珣戈戈緩緩緩緩通德之門納善善幽閑之操禮禮容外外外備
- 36 規範內凝琴瑟瑟克諧松蘿叶契道道長運短一謝謝不追人
- 37 之云亡朋僚殄殄殄粵粵以其年歲次次戊戌十一月月
- 38 乙巳朔四四日戊申葬于醴泉縣神跡鄉爰發明詔陪衛通
- 39 德之門納結幽閑之操禮禮容外外外備備規範內凝琴
- 40 光祿祿大夫仍錫器器玩凡所虜獲即以畀之
- 41 及夫元戎戎河拯溺畿甸乘乘乘乘輶移指克



4 2 寧寧京室常常在顏行每當馳道道疇庸  
 4 3 有典俾從大賚策勳三最賜帛萬匹又增雜  
 4 4 綵加以金錢于時九服服未清四郊多壘壘  
 4 5 月日用烽燧不息公每光祿大夫仍錫器玩凡所  
 4 6 虜獲即以畀之及夫元戎濟河拯溺畿甸  
 4 7 乘輶移指克寧京室常在顏行每當馳道道疇庸  
 4 8 有典俾從大賚策勳三最賜帛萬匹又增雜綵加以金  
 4 9 錢于時九服未清四郊多壘戈日月烽燧燧不息息公每筵神  
 5 0 麾驟參皇駕東西龕定匪遑晏處故能轉戰仍穀涉  
 5 1 血塞旗長駟汧隴禽敵制勝德元年拜上柱國封康國  
 5 2 公食邑三千戶賜繪一段生口卅人錦衣一襲以示榮寵三年  
 5 3 授右翊衛將軍軍六郡良家九卿任子統戡禁旅朝寄  
 5 4 寄

### 「史大奈碑」復原文

……攸贊（贊），地寶咸格。祖莫賀可汗，鐘純粹之□□，莫崇高之統業，無競惟烈，有道可宗，固已韶韶，穆重徽猷，大繼（繼）武威，暢廬山之澤，流昌海之域。<sup>8</sup>父失咄弓彌設，<sup>9</sup>忠能贊（贊）國，孝實安親，任重棟梁，賴深舟楫。公夙彰奇表，幼有大志，深沈靡測，卓卓不群。勇過苻攸，劔（劍）動飛猿（猿）；弓踰慶忌，射穿懸虱。有隨（隨）之季，聲馳中國，煬帝聞而嘉之，固就招聘，輜軒結徹，璧帛相仍。大業七年，奉珎（珍）入侍，禮（禮）同戚屬，寵冠列蕃。亟會五月之期，時參八神之祀。仍屬本邦危亂，歸路莫從，留滯京華，常陪鑾蹕。遼東之役，固請先駟（驅）陷陣，功多特超諸校，賞物千段，授金紫光〔祿〕大夫。既而漠北餘眾，自西徂東，靡所底居，思我遺愛。十二年，詔率所部，屯次晉陽，糾合舊〔部〕。旋以黃星耀采，徂運告終，青社發明，聖人有作義旗、建景業，惟新物色。熊羆罔懷，族類秀逸。公獻竹籌，莫昧竭節，經綸參同，德克翦方。命北清徽塞，南掃城邑。〔授〕光祿大夫，仍錫器玩，凡所虜獲，即以畀之。及夫元戎濟河，拯溺畿甸，乘輶移指，克寧京室。常在顏行，每當馳道，疇庸有典，俾從大賚，策勳三最，賜帛萬匹，又增雜綵，加以金錢。於時九服未清，四郊多壘，〔兵〕戈日用，烽燧不息。公每筵神麾，驟參皇駕，東西龕定，匪遑晏處，故能轉戰仞（仞）谷，涉血搴旗，長駟（驅）汧隴，禽（擒）敵制勝。〔武〕德元年，拜上柱國，封康國公，食邑三千戶，賜繒一千段，生口卅人，錦衣一襲，以示榮寵。三年，授右翊衛將軍。六郡良家，九卿任子，統茲禁旅，朝寄尤隆。得喪無屑襟抱。始自遐方，早飛譽於鱗角；晚逢嘉會，終勒美於瑀戈。結媛通德之門，納善幽閑之操。禮容外備（備），規範內凝，琴瑟克諧，松蘿叶（葉）契。道長運短，一謝不追。人之云亡，朋僚珍悴。粵以其年歲次戊戌十一月乙巳朔四日戊申，葬於醴泉縣神跡（迹）

<sup>8</sup> 游文的復原文是「流昌海之城」。

<sup>9</sup> 游文的復原文是「父失咄彌設」。

鄉。爰發明詔，陪衛〔昭陵〕。

\* 符號說明：

□：表缺字。

( )：表釋讀。

[ ]：表補字。

## 一、史大柰世系

傳統史籍文獻關於史大柰的出身載記十分零星有限，《新唐書·史大柰傳》僅云：「本西突厥特勒」；<sup>10</sup>唐人林寶，《元和姓纂·河南史氏》記載：「突厥科羅次汗子，生蘇尼失。入隋，封康國公。懷德郡王。生大柰……。」<sup>11</sup>由於《元和姓纂》在北宋時即頗有散佚，南宋時已難得完本，明初以後此書即失傳，加之以林寶以二十句編撰完成此書，因而出現援引訛謬、考稽失實、世代顛倒等現象，<sup>12</sup>以致現存《姓纂》殘訛難讀。《元和姓纂·河南史氏》在敘述突厥阿史那氏入居中原後的世系發展即出現訛謬、失實、世代顛倒、中間略去一兩代、甥與姪並舉等情形；《新唐書·史大柰傳》又失之簡略，這為我們研究史大柰出身帶來很大的困

<sup>10</sup> 北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110，〈諸夷蕃將傳·史大柰〉，頁4111；清·高宗敕撰，《續通志》（臺北：新興書局，1963），卷217，〈唐十七·史大柰傳〉，頁4551-1。又，「特勒」，為突厥語“tegin”的音譯，伯希和（Paul Pelliot），〈中亞史地叢考〉（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Asie central），沙畹（Edouard Chavannes）等著，馮承鈞譯，《大月氏都城考》（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指出唐人譯tegin常作「特勤」（常誤作特勒），頁66。馮永軒，〈「特勒」非誤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編，余婉卉選編，《馮永軒文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主張「特勒」並非是「特勤」之偽誤，「勤」、「勒」在音韻學上音近，為一音之轉，在史書中還有不同的寫法，諸如「特瑾」、「敕瑾」、「敕勤」、「狄銀」、「的斤」、「的乞」、「德濟」、「德克津」、「別吉」、「特濟」、「達臘」、「達喇」、「台吉」等，翻譯者各以音近之字譯之，而產生出不同的譯字，也就是說譯名無定形。特勤、特勒是一名的兩樣寫法，沒有誰是誰非之分，頁67-73。

<sup>11</sup> 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郁賢皓、陶敏整理，孫望審訂，《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6，〈六止·河南史氏〉，頁825。

<sup>12</sup> 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郁賢皓、陶敏整理，孫望審訂，《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前言〉，頁1。

難。<sup>13</sup>可喜的是，現在可以根據史大奈碑內容重新建構出史大奈的世系。

碑文云：「祖莫賀可汗」。案：「莫賀」，又稱「莫何」、「摩何」，最早出現於鮮卑吐谷渾、乞伏、拓跋等部落，一般認為是突厥語“bagha”的不同音譯，意指「英雄勇士」(bagatur)，<sup>14</sup>語源出於古代中亞伊朗語，意指「神」，<sup>15</sup>屬於修飾官稱的官號 (appellation for the official title)，廣泛被北方諸族用於指稱部落酋長。夏德 (Friedrich Hirth) 認為，匈奴「冒頓」一詞亦是從“bagatur”音譯而來，<sup>16</sup>也有學者持不同的看法。<sup>17</sup>考察隋唐時期突厥族被稱為莫賀 (何) 可汗者有攝圖與處羅侯兩人，其中以開皇七年 (587) 二月被隋文帝冊立為莫何可汗以繼承沙鉢略可汗的處羅侯是史大奈

<sup>13</sup> 朱振宏，〈新見兩方突厥族史氏家族墓誌研究〉，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八輯 (北京，2013.12)，曾據史籍記載，推測阿史那大奈的出身有兩種可能性：一是泥掘處羅可汗的大弟；二是婆實特勤之子，泥掘處羅可汗的堂兄弟，頁209-210。

<sup>14</sup> 白鳥庫吉，〈室韋考〉，《白鳥庫吉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70)，第四卷，「塞外民族史研究 (上)」，「莫賀」、「莫何」為“Bagapuhr”之對音，其意為勇健頁451-453；Clouston, Sir Gerard,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72), p. 313. Tâlat Tekin, *Tunyukuk Yazıtı* (Ankara: Simg, 1994), pp. 4-5. 周偉洲，〈敕勒與柔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指出莫弗 (莫何) 意為勇健者，或酋長之意，後轉為酋長之稱，頁137、140。

<sup>15</sup> Sanping Chen, “Son of Heaven and Son of God”, *Multicultural China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認為莫緣、莫何、莫賀弗，語源上分析應當來自於古伊朗語的“Bagapuhr”之對音，表「神之子」(son of God) 之意，pp.119-156；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頁109。

<sup>16</sup> Friedrich Hirth, 〈亞的拉 (Attilas) 世系考〉及《中國古代史》第五章，轉引自方壯猷，〈匈奴語言考〉，《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2：4 (北京，1930.12)，頁708。

<sup>17</sup> 伯希和 (Paul Pelliot) 著，馮承鈞譯，〈吐谷渾為蒙古語系人種說〉，伯希和等著，馮承鈞譯，《蒙哥》(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認為《吐谷渾列傳》所志譯名，又有「莫賀」，猶言父也。此莫賀一名，在突厥語中，實非固有，余以為此號或為蠕蠕及吐谷渾所并用，而突厥又假借於蠕蠕者也。按蒙古語有abaqa之稱，猶言諸父也，莫賀或為其省譯，頁81；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白鳥庫吉全集》，第四卷，「塞外民族史研究 (上)」，亦認為鮮卑語「莫賀」為abaga的對音，始音“a”省略，頁144。羅新，〈虞弘墓誌所見的柔然官制〉，《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則認為Baqa/bagha一詞的語源 (etymology) 難有明確的回答，中古時期阿爾泰語系中baqa: tu: r一詞只可能是「莫賀咄」，而不是「莫賀」，頁112-113。

祖父的可能性最大。<sup>18</sup>史載處羅侯為沙鉢略可汗攝圖之弟，<sup>19</sup>而攝圖為乙息記可汗科羅之子，<sup>20</sup>是以，攝圖與處羅侯同為東突厥開國者土門（布民）的後裔，兩人為兄弟關係。<sup>21</sup>開皇七年二月，沙鉢略可汗病卒，<sup>22</sup>處羅侯繼任大可汗位，是為莫何可汗（又稱葉護可汗）。<sup>23</sup>處羅侯卒逝時間，史籍無明確記載，推測是在開皇七年四月，<sup>24</sup>因西征西突厥達頭可汗，中流矢而卒。<sup>25</sup>傳統文獻並沒有關於處羅侯子嗣的記載，從碑文中我們得知處羅侯有一子，姓名不詳，在東突厥的政治名號稱為失咄弓彌設，即是史大奈的父親。又從近年新出「史思光墓誌」得知，此失咄弓彌設名曰「統」，隋朝曾冊授光祿大夫。<sup>26</sup>史載史大奈有一子，名仁表，尙唐太宗第八

<sup>18</sup> 游自勇、趙洋，〈敦煌寫本S.2078V「史大奈碑」習字之研究〉，頁173。

<sup>19</sup> 唐·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84，〈北狄傳·突厥〉記載：「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悞，遣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頁1870；同書，卷51，〈長孫晟傳〉記載：「（攝圖）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頁1330。

<sup>20</sup> 《隋書》，卷84，〈北狄傳·突厥〉記載：「逸可汗立（筆者案：科羅，建號乙息記可汗），又破茹茹，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斗，稱為木杆可汗。」，頁1864。

<sup>21</sup> 本文所述突厥各可汗之間彼此世系關係，詳見〔附表三〕。

<sup>22</sup> 《隋書》，卷84，〈北狄傳·突厥〉記載：「（開皇）七年正月，沙鉢略遣其子入貢方物……還至紫河鎮，其牙帳為火所燒，沙鉢略惡之，月餘而卒。」，頁1870，可見沙鉢略可汗卒於開皇七年二月間。

<sup>23</sup> 《隋書》，卷51，〈長孫晟傳〉記載：「（開皇）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頁1332；同書，卷84，〈北狄傳·突厥〉記載：「處羅侯竟立，是為葉護可汗」，頁1871。此外，本文所述東、西突厥傳承次序與傳承關係，詳見〔附表四〕。

<sup>24</sup> 《隋書》，卷84，〈北狄傳·突厥〉僅云：「其後，處羅侯又西征，中流矢而卒」，頁1871；同書，卷51，〈長孫晟傳〉也只記：「（開皇八年〔588〕），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虞）閭」，頁1332。上述所記，似乎處羅侯卒逝於開皇八年。然《隋書·高祖紀上》有云：「（開皇）七年夏四月……突厥沙鉢略可汗卒，其子雍虞閭嗣立，是為都藍可汗」，頁25。按史籍所載，沙鉢略可汗卒逝後，即大可汗位者是處羅侯而非雍虞閭，〈高祖紀上〉漏記處羅侯即位事蹟，我們從〈高祖紀上〉的記載，可知雍虞閭即大可汗位的時間是在開皇七年四月，易言之，處羅侯必卒逝於開皇七年四月（或四月以前）。

<sup>25</sup> 《隋書》，卷84，〈北狄傳·突厥〉，頁1871。關於莫何可汗出兵西征對象，中外學術界有著不同的看法，詳參朱振宏，《西突厥與隋朝關係史研究（581-617）》（新北：稻鄉出版社，2015），頁157-160。

<sup>26</sup> 2015年8月，筆者前往中國大陸河南省洛陽市進行調研工作，考察其間在洛陽「財源堂墓誌收藏館」新見一方唐代突厥族「史思光墓誌」，誌文內容有云：「公諱思

女普安公主。<sup>27</sup>從「史思光墓誌」記載，史大奈另有一子，名仁基。茲將史大奈世系製表如〔附表二〕。

## 二、史大奈入隋原因

杜佑，《通典·突厥下》記載：

處羅可汗，隋煬帝大業中，與特勤大奈入朝。<sup>28</sup>

同書，同卷，又載：

特勤大奈，隋大業中與曷薩那可汗（筆者案：即處羅可汗）同歸中國。<sup>29</sup>

《新唐書·史大奈傳》也記載：

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也，與處羅可汗入朝，事煬帝。<sup>30</sup>

這裡須要探究的是，為何屬東突厥土門系莫何可汗之孫的史大奈會成為西突厥的特勤，並隨泥掘處羅可汗一同入隋？<sup>31</sup>史大奈碑與史籍文獻都沒有記載史大奈到西突厥的原因，我們認為此當從隋文帝開皇七年阿波可汗被莫何可汗擒獲後的東突厥政治情勢求之。開皇三年（583）二月，東突厥沙鉢略可汗曾率領西面小可汗

光，字昭覺，河南洛陽人也。……曾祖統，隨光祿大夫。祖大奈，……父仁基，左右金吾將軍。綿、華、寧三州刺史。上柱國。樂陵縣開國侯。」。從該墓誌結合史大奈神道碑，史大奈父親為阿史那統。

<sup>27</sup> 《新唐書》，卷83，〈諸帝公主·太宗二十一女〉，頁3646。北宋·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6，〈公主〉，頁73；同書，卷21，〈陪陵名位〉，頁480。

<sup>28</sup> 唐·杜佑撰，王文錦、王永興、劉俊文、徐庭雲、謝方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199，〈邊防典十五·突厥下〉，頁5454。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194下，〈突厥傳下〉，所記略同，頁5180。

<sup>29</sup> 杜佑撰，王文錦、王永興、劉俊文、徐庭雲、謝方點校，《通典》，卷199，〈邊防典十五·突厥下〉，頁5454。《舊唐書》，卷194下，〈突厥傳下〉，頁5180。

<sup>30</sup> 《新唐書》，卷110，〈諸夷蕃將傳·史大奈〉，頁4111。

<sup>31</sup> 處羅可汗，西突厥政治名號的全稱為泥掘處羅可汗，本名達漫，大業七年（611）底入隋後，煬帝改稱為曷薩那可汗，其後唐高祖李淵又封為歸義郡王。為了行文上的方便，同時避免閱讀上的紊亂，除徵引史料外，一律稱為泥掘處羅可汗。

阿波可汗、貪汗可汗等舉兵入侵隋邊，<sup>32</sup>隋文帝下詔討伐，隋軍分八道，以三路進擊東突厥。<sup>33</sup>西路兵團由行軍元帥竇榮定領軍，率行軍都督姚辯、史射勿等人與東突厥戰於涼州高越原（甘肅省武威縣北）。<sup>34</sup>《隋書·竇榮定傳》有詳細記載：

突厥沙鉢略寇邊，（竇榮定）以為行軍元帥，率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其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有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乃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sup>35</sup>

竇榮定在高越原遭遇阿波可汗，因及時降雨，使竇榮定由敗轉勝，五月壬戌（二十五日）擊敗阿波。<sup>36</sup>《隋書·長孫晟傳》又載道：

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長孫）晟為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恥，豈不內愧於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眾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

<sup>32</sup> 《隋書》，卷1，〈高祖紀上〉，頁18、同書，卷84，〈北狄傳·突厥〉，頁1867。

<sup>33</sup> 《隋書》，卷51，〈長孫晟傳〉，頁1331。

<sup>34</sup> 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隋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卷14，〈姚辯墓誌銘〉記載：「（開皇）二年（筆者案：當為三年），匈奴入涼州，詔以公為行軍都督，前後衝擊，晝夜攻圍，校尉之井既枯，將軍之泉又竭，空有思梅之鞅，以亡為存，策勳命賞，理在不次。」，頁4094上。顧鐵符，〈隋姚辯墓誌銘傳本小議〉，《故宮博物院院刊》，52（北京，1991.4），指出史書所載，這兩年對北方戰爭，主要是對突厥，其次是對吐谷渾，對匈奴的戰爭可能規模不大，頁10。隋唐時期，史書、墓誌銘常以匈奴代指突厥；單于代指可汗。文中匈奴，實指東突厥，顧鐵符所述不確。由〈姚辯墓誌銘〉所記內容與《隋書·竇榮定傳》相符，由此可知開皇三年東突厥入侵，姚辯亦隨竇榮定軍隊，與東突厥阿波可汗戰於涼州。又據〈史射勿墓誌〉，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記載：「開皇三年，（史射勿）應募隨上開府姚辯北征，隨方剿撲。又從安豐公，高越盡銳攻圍。」，頁565。安豐公即是指竇榮定，高越即是指高越原。由墓誌亦可知粟特胡人史射勿亦隨竇榮定、姚辯出討東突厥。

<sup>35</sup> 《隋書》，卷39，〈竇榮定傳〉，頁1151。

<sup>36</sup> 《隋書》，卷1，〈高祖紀上〉，頁19。

辱。攝圖必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邪？」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晟入朝。<sup>37</sup>

長孫晟利用阿波可汗與沙鉢略可汗之間的矛盾，成功說服阿波依附隋主，連結西突厥達頭可汗，共抗沙鉢略。阿波可汗在同年六月戊寅（十一日），派遣使者隨長孫晟入隋廷請和。<sup>38</sup>沙鉢略可汗被楊爽擊敗於白道後，又聽聞阿波可汗內附隋廷，擅自遣使與隋朝請和，憤而退兵，北返漠北，轉攻阿波可汗牙帳。《隋書·長孫晟傳》記載：

攝圖……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眾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筆者案：即西突厥達頭可汗），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數萬，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張。<sup>39</sup>

引文中所謂的「阿波懷貳」，就是指阿波與隋朝結盟而先行退兵。沙鉢略以「阿波懷貳」為理由出兵討擊，目的是要從根本上消滅阿波可汗在東突厥的政治勢力，<sup>40</sup>然而結果卻適得其反，西突厥達頭可汗以十餘萬眾助阿波東擊沙鉢略可汗，收復阿波故有之舊

<sup>37</sup> 《隋書》，卷51，〈長孫晟傳〉，頁1331。

<sup>38</sup> 《隋書》，卷1，〈高祖紀上〉記載：「（開皇三年）六月……戊寅，突厥遣使請和」，頁19。《隋書》雖未記載此次東突厥請和，是由東突厥哪一位可汗所派遣，不過，從〈高祖紀上〉記寶榮定於五月壬戌，擊敗阿波可汗以及〈長孫晟傳〉所記阿波可汗使人隨晟入朝，可以研判此次請和者，當是阿波可汗所派遣。

<sup>39</sup> 《隋書》，卷51，〈長孫晟傳〉，頁1332。

<sup>40</sup> 劉健明，《隋代政治與對外政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認為沙鉢略侵隋，結果大敗而回，聲望受損，地位出現動搖，為了鞏固個人地位，知悉長孫晟曾與阿波聯擊，遂指責阿波先退兵，襲擊其部落，頁204。任寶磊，〈新疆地區的突厥遺存與突厥史地研究〉（西安：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未刊本博士論文，2013），指出沙鉢略此舉一是憤恨阿波懷貳，二是顧忌阿波投靠隋朝之後實力增強對己不利，故先下手為強，頁80。阿波可汗曾因東突厥大可汗繼承問題與沙鉢略產生嫌隙，沙鉢略可汗想藉此機會將阿波可汗在東突厥勢力一舉消滅，以剪除對自己的威脅，參看朱振宏，《西突厥與隋朝關係史研究（581-617）》，頁89-102。

地。沙鉢略征討阿波失敗後，國勢日衰，開皇四年（584）九月，沙鉢略遣使向隋朝貢和親，<sup>41</sup>次年（585）七月，沙鉢略又上表向隋稱臣，<sup>42</sup>隋文帝下詔沙鉢略可汗並與東突厥建立君臣關係。<sup>43</sup>開皇六年（586），隋朝頒曆於東突厥，<sup>44</sup>確認隋朝宗主國的政治地位，<sup>45</sup>自此東突厥臣屬於隋。在東突厥沙鉢略可汗降附隋廷後，此時對隋朝產生新威脅的是原屬東突厥西面小可汗的阿波可汗。史載阿波可汗在叛離東突厥依附西突厥達頭可汗後，勢力益張，「東距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sup>46</sup>前述開皇三年五月，竇榮定率兵擊潰南犯的阿波可汗，長孫晟曾成功說服阿波依附隋朝，阿波亦於同年六月遣使與長孫晟入隋請和，雙方關係一度獲得和緩，但是隨著沙鉢略可汗與隋朝關係改善，以及西突厥達頭可汗對阿波施以軍事援助，阿波可汗對於隋朝接受沙鉢略可汗的請降內附感到不滿，甚至有取代沙鉢略成爲東突厥大可汗的意圖，這使得隋與阿波可汗產生緊張與對立。開皇六年、七年，隋朝連續兩年發丁興修長城，<sup>47</sup>顯示出隋朝與阿波

<sup>41</sup> 《隋書》，卷51，〈長孫晟傳〉，頁1332；同書，卷84，〈北狄傳·突厥〉記載：「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為一子之例。」，頁1868；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176，〈陳紀十〉，長城公至德二年九月條，頁5475。

<sup>42</sup> 《隋書》，卷84，〈北狄傳·突厥〉，頁1869-1870。

<sup>43</sup> 唐·許敬宗編，羅國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664，〈隋文帝頒下突厥稱臣詔一首〉，頁243。《隋書》，卷84，〈北狄傳·突厥〉有摘錄此一詔書，頁1870，文句與《文館詞林》略有差異，可相互參照。

<sup>44</sup> 《隋書》，卷1，〈高祖紀上〉記載：「（開皇六年春正月）庚午（十九日），班曆於突厥。」，頁23。

<sup>45</sup> 路易·巴贊（Louis Bazin）著，耿昇譯，《突厥曆法研究》（*Les Systemes Chronologiques Dans Le Monde Turc Ancien*）（北京：中華書局，1998），指出「頒曆」是中國中原的習慣，做爲一種宗主權的標誌，向附近地區頒行中國曆法，以至於「受曆」就相當於「承認爲其爲附庸」，頁161。伯希和，〈中亞史地叢考〉，中國之班曆，其目的不在以天文曆數之說輸入突厥，以班曆外國而表示其上邦之權，受曆云者，猶言稱臣，頁47。林幹，《突厥與回紇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頒曆表示突厥接受隋朝正朔。所謂正朔，也就是曆法。依照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習慣，「受正朔」即表示接受中原中央王朝的統一領導，頁53，註釋3。關於隋朝與東突厥關係發展及其變化，可參看護雅夫，〈第一編 突厥の国家と社会〉，《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1967），I，頁161-176。

<sup>46</sup> 《隋書》，卷84，〈北狄傳·西突厥〉，頁1876。

<sup>47</sup> 《隋書》，卷1，〈高祖紀上〉記載：「（開皇六年二月）丁亥（六日），發丁男十一萬

可汗緊張關係逐漸升溫。開皇七年二月，沙鉢略可汗病卒，處羅侯繼任大可汗位，建號莫何可汗。<sup>48</sup>處羅侯爲其兄長報復阿波可汗叛離之仇，乃依恃隋朝的軍事力量，以隋文帝所賜幡旗、鼓吹，率軍西征阿波，在莫何可汗的征討下，阿波可汗內部紛紛叛離，最終莫何可汗生擒阿波，化解隋朝與阿波可汗緊張對立的局勢。<sup>49</sup>

莫何可汗生擒阿波可汗後，由鞅素特勤之子泥利可汗接替阿波可汗在東突厥的政治地位。<sup>50</sup>鞅素特勤爲阿波可汗弟，<sup>51</sup>兩人同是東突厥木杆可汗後裔，是以阿波與泥利可汗爲伯侄關係。莫何可汗因「阿波事件」對於泥利可汗擔任東突厥西部小可汗懷有疑

---

修築長城，二旬而罷。……（七年二月）是月，發丁男十萬餘修築長城，二旬而罷。」，頁23、24。

<sup>48</sup> 沙鉢略可汗死後，出現處羅侯與雍虞閭相互推讓中面大可汗位，最後由處羅侯繼任。可參看《隋書》，卷84，〈北狄傳·突厥〉，頁1870-1871。

<sup>49</sup> 《隋書》，卷84，〈北狄傳·突厥〉，頁1871。劉健明，《隋代政治與對外政策》，以爲處羅侯既獲得隋朝賜予鼓吹幡旗，遂謀強化大可汗的地位，擬派兵進襲阿波，並請求隋朝的支持。隋文帝召集大臣商議，元諧與李充都主張容許處羅侯清除阿波，但長孫晟明白處羅侯會因此坐大，主張兩存，不支持消滅阿波。處羅侯不顧隋的反對，悍然以隋所賜的旗鼓西征阿波，由此可見處羅侯絕不甘心受制於隋朝，頁207。此一解釋值得商榷，劉氏將處羅侯西征以及處羅侯生擒阿波後，隋朝如何處理阿波的問題兩件事情相互混淆。史籍所記元諧、李充、長孫晟等人的意見是指處羅侯西征生擒阿波可汗後，如何處置阿波所做的論辯，此與處羅侯西征阿波，實屬兩件事情，並不相涉。依《隋書·高祖紀上》記載：開皇六年、七年文帝下令修築長城，可以知道阿波可汗力量的日益強大已對隋朝的國防安全構成威脅，隋朝沒有理由阻止處羅侯的西征，筆者甚至認爲隋廷正想藉由處羅侯征討阿波，使東突厥的國力愈來愈弱，這對於隋朝百利而無一害。

<sup>50</sup> 《隋書》，卷84，〈北狄傳·西突厥〉，記載：「大邏便（筆者案：即阿波可汗）爲處羅侯所執，其國立鞅素特勤之子，是爲泥利可汗。」，頁1876。

<sup>51</sup> 關於鞅素特勤的出身，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1953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昭蘇縣特克斯河支流小洪那海（Little Khonakhai）發現一個刻有二十行粟特文字的突厥石人像，稱爲「小洪那海突厥石人」。通過中外學者學者們對「小洪那海石人」底座二十行粟特文字研究分析，就目前所能釋讀出的文字，可以確認這是泥利可汗的石人像，銘文東面第六一七行記載：「木杆可汗之孫、突厥君主泥利可汗於羊年（587）即位。」依據銘文的記載，泥利可汗爲木杆可汗之孫；而史籍記載泥利可汗爲鞅素特勤之子，由此可知鞅素特勤與阿波可汗大邏便皆是木杆可汗之子，兩人爲兄弟關係。有關「小洪那海石人」底座粟特文的釋讀，可參看林梅村，〈小洪那海突厥可汗陵園調查記〉，《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259-275；陳凌，《突厥汗國與歐亞文化交流的考古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23-24。

慮，深恐泥利可汗仿效阿波反叛故事，於是以其子失咄弓彌設至泥利可汗所，監控泥利可汗動靜。案：「設」，又有作「殺」、「察」、「煞」、「失」等，是突厥語“šad”的不同音譯，為鮮卑、柔然民族的政治官稱（title for the official position），其意為擁有封建領土，掌握軍政大權之諸侯。<sup>52</sup>《舊唐書·突厥傳上》記載道：

可汗者，猶古之單于，……其子弟謂之特勤，別部領兵者皆謂之設。<sup>53</sup>

《周書·突厥傳》記載：

大官有葉護，次設，次特勤，次俟利發，次吐屯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為之。<sup>54</sup>

從引文中可知，「特勤」及「設」皆是由阿史那氏弟子擔任，而「設」更負有典兵之權。在突厥的政治官稱中，「設」的地位又高於「特勤」。莫何可汗以其子失咄弓彌設領兵，不無具有監管東突厥西面泥利可汗的政治意義。

莫何可汗卒逝後，由沙鉢略可汗之子雍虞閭繼承大可汗位，建號都藍可汗。都藍可汗時代，泥利可汗仍掌東突厥西面。開皇十三年（593），先有流人楊欽亡入東突厥，唆使都藍可汗離隋，大義公主又與所從粟特胡安遂迦私通，並與泥利可汗私相連結。<sup>55</sup>隋廷認為都藍可汗的反隋，主要是受到楊欽與大義公主的影響，故一方面向都藍索求楊欽，一方面揭露大義公主與安遂迦私通，與泥利可汗私連等行爲，東突厥國人大恥，都藍可汗乃將楊欽、安

<sup>52</sup> 林恩顯，〈突厥政治社會制度〉，《突厥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87。

<sup>53</sup> 《舊唐書》，卷194上，〈突厥傳上〉，頁5153。

<sup>54</sup> 唐·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50，〈異域傳下·突厥〉，頁909。又見《隋書》，卷84，〈北狄傳·突厥〉，頁1864。

<sup>55</sup> 《隋書》，卷51，〈長孫晟傳〉，頁1332；同書，卷84，〈北狄傳·突厥〉，頁1871-1872。

遂迦交付長孫晟，並將大義公主殺害。<sup>56</sup>上文已云在沙鉢略可汗時代，由於阿波可汗懷貳叛離奔附西突厥，曾使沙鉢略率兵征討阿波，最終造成東突厥衰微。此時泥利可汗與大義公主私自聯繫一事被揭發，泥利可汗唯恐都藍可汗以此報復，於是再次率部脫離東突厥，依附西突厥達頭可汗。當泥利可汗率眾依附達頭可汗，失咄弓彌設生怕都藍可汗怪罪其監管不周，於是也率其子史大奈等人亡奔西突厥。

失咄弓彌設的卒逝時間不詳，不過我們可從西突厥的歷史發展考察。隋文帝仁壽三年，原先臣屬西突厥的思結、伏利具、渾、僕骨等鐵勒十餘部眾反叛，達頭可汗遣其子都六（咄陸）葉護與泥利可汗一同出兵征討，結果反被鐵勒所敗，並由此造成西突厥國內大亂，奚、霫五部皆內徙隋境，達頭可汗亡奔吐谷渾，<sup>57</sup>泥利可汗也在這場征討鐵勒戰役之後不久卒逝，<sup>58</sup>推測失咄弓彌設也很可能參與此役出征，而在戰爭中過世。達頭可汗逃奔吐谷渾後，一時間西突厥汗國群龍無首，國人乃擁立泥利之子達漫接替達頭可汗位，建號泥擲處羅可汗，成為西突厥第三任的大可汗。達漫繼立西突厥大可汗後，以宗室弟子史大奈為特勤。可注意者，史大奈擔任「特勤」而非「設」，代表著泥擲處羅可汗奪其領兵之權並暗降政治地位。

泥擲處羅可汗繼任大可汗之初，重新征服叛離的鐵勒諸部，

<sup>56</sup> 《隋書》，卷51，〈長孫晟傳〉，頁1332；同書，卷67，〈裴矩傳〉，頁1578；同書，卷84，〈北狄傳·突厥〉，頁1872。

<sup>57</sup> 《隋書》，卷84，〈北狄傳·突厥〉，頁1874。

<sup>58</sup> 有關泥利可汗卒逝的時間，史籍載記不一：一是，隋文帝開皇二十年（600）；一是，隋文帝仁壽三（603）—四年（604）。沙畹（Edouard Chavannes）著，馮承鈞譯，《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 Kiue Occidentaux*）（北京：中華書局，2004）一書中認為：「達頭之出奔既在603年，而處羅始見於《隋書》之年為大業元年（605），則泥利可汗之死，應在603-604年之間，或即在603年也。」，頁44；吳玉貴，〈高昌供食文書中的突厥〉，《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蘭州，1991.3），亦認為泥利可汗去逝與泥擲處羅可汗繼位，應同在仁壽三年至四年之間，頁50-51。《隋書》，卷84，〈北狄傳·突厥〉記載：「是歲（筆者案：仁壽三年，603），泥利可汗及（咄陸）葉護俱被鐵勒所敗。」，頁1874。由此可知仁壽三年時，泥利可汗尚在，又據「泥利可汗的石人像」底座粟特文北面第2-3行記載，泥利可汗卒於鼠年，即隋文帝仁壽四年。

一度恢復自伊犁河至錫爾河流域達頭可汗舊有的疆域。<sup>59</sup>然不久泥獞處羅可汗統御無方，「政苛察多忌」，<sup>60</sup>導致臣屬於西突厥山的鐵勒諸部落不滿，紛紛叛離，<sup>61</sup>泥獞處羅可汗發兵征討，然其軍事行動並未取得效果，反被鐵勒所敗。<sup>62</sup>

是時，隋煬帝正積極經營西域，<sup>63</sup>黃門侍郎裴矩奉煬帝之命，在敦煌招撫西域胡商，當聽聞鐵勒諸部落反叛，西突厥國亂，裴矩認為可利用此一機會招納泥獞處羅可汗，使西突厥內附，成為隋朝的屬國，於是上奏朝廷，大業四年（608）二月己卯（六日），煬帝派遣崔毅齎書赴西突厥，<sup>64</sup>要求泥獞處羅可汗向隋稱臣。<sup>65</sup>在崔毅的用計利誘之下，泥獞處羅可汗向隋朝通貢，但西突厥國人對於內附隋廷抱有疑慮，以至於大業六年（610），煬帝西巡，遣侍御史韋節召泥獞處羅可汗，令與車駕會於大斗拔谷時，泥獞處羅遣使辭以他故，並未前往，煬帝雖大怒，然亦無可如何。<sup>66</sup>不久，隋朝再利用西突厥小可汗射匱遣使請婚之機會，最終

<sup>59</sup> 內田吟風，〈西突厥初世史の研究〉，《北アジア史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舍，1975），頁460-461。

<sup>60</sup> 《新唐書》，卷215下，〈突厥傳下〉，頁6056。

<sup>61</sup> 《隋書》，卷84，〈北狄傳·鐵勒〉，頁1880。《舊唐書》，卷199下，〈北狄傳·鐵勒〉，頁5343-5344。

<sup>62</sup> 《隋書》，卷84，〈北狄傳·西突厥〉，頁1877。有關鐵勒叛離過程，可參看段連勤，《隋唐時期的薛延陀》（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頁36-42；錢伯泉，〈鐵勒國史鈞沉〉，《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蘭州，1992.3），頁95-97；馬馳，〈鐵勒契苾部的盛衰與遷徙〉，《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第3期（西安，1999.9），頁95-99。

<sup>63</sup> 隋朝於文帝時代已開始與西域諸國發生關係，但隋朝正式經營西域，則是在煬帝大業五年（609）平定吐谷渾之後。詳參余太山，〈隋與西域諸國關係述考〉，《文史》，69（北京，2004.11），頁49-57、Yu Taishan, "The Sui Dynasty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Sino-Platonic Papers*, No. 247 (2014.4), pp.1-24。

<sup>64</sup> 「崔毅」，《隋書·西突厥傳》作「崔君肅」。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58），研究指出：隋、唐人多以字行，「毅」或其名，「君肅」或其字也，頁92；又可參看岑仲勉，《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北京：中華書局，1964），頁15。本文為行文上之方便，除徵引史料外，均稱崔毅。

<sup>65</sup> 《隋書》，卷3，〈煬帝紀上〉，頁71；同書，卷84，〈北狄傳·西突厥〉，頁1877-1878；北宋·王欽若等編纂，周勳初等校訂，《冊府元龜（校訂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卷652，〈奉使部（一）·宣國威〉，頁7523-7524、同書，卷657，〈奉使部（六）·機變〉，頁7585。

<sup>66</sup> 《隋書》，卷84，〈北狄傳·西突厥〉，頁1878。

促使泥獞處羅可汗在大業七年率眾臣屬隋朝。《隋書·西突厥傳》對此過程有詳記：

適會其（筆者案：指西突厥）酋長射匱遣使求婚，裴矩因奏曰：「（泥獞）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也。……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sup>67</sup>

引文中裴矩所言「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是指出西突厥自建國以來皆是由室點密一系世襲大可汗位，然而現在屬室點密系的射匱可汗卻是附隸於東突厥土門系的泥獞處羅可汗統治之下。隋朝曾經在開皇十七年（597）利用和親的方式，成功離間了東突厥雍虞閭（都藍可汗）與染干（突利可汗）關係，最終造成都藍可汗被殺，染干受隋冊封並內附隋廷。<sup>68</sup>裴矩認為可以再次以和親手段，離間西突厥內部射匱可汗與泥獞處羅可汗之間關係，弱化泥獞可汗勢力，並造成西突厥內部的分裂。煬帝贊同裴矩的看法，於是在大興城大興宮仁風殿接見射匱可汗使者，<sup>69</sup>允諾射匱在誅除泥獞處羅可汗後，將以射匱為西突厥大可汗並與之和親。果不其然，射匱興兵襲擊泥獞處羅可汗，泥

<sup>67</sup> 《隋書》，卷84，〈北狄傳·西突厥〉，頁1878。。

<sup>68</sup> 《隋書》，卷51，〈長孫晟傳〉，頁1333-1334。

<sup>69</sup> 「仁風殿」位於隋大興城大興宮內，參看辛德勇，〈隋大興城坊考稿〉，《縱心所欲——徜徉于稀見與常見書之間》（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208。

掘處羅大敗，率弟闕達度設、<sup>70</sup>阿史那大奈特勤等數千騎亡奔高昌附近的時羅漫山（即天山），<sup>71</sup>煬帝遣裴矩與泥掘處羅可汗母親向氏的親要共赴玉門關晉昌城見處羅，在向氏親要的勸諭下，最後泥掘處羅與其弟闕達度設，以及史大奈等人入隋歸降。

史載大業七年泥掘處羅可汗被射匱可汗擊敗後，「將左右數千騎東走」，我們從已知入隋的泥掘處羅可汗、闕達度設、史大奈等人皆是來自於東突厥土門系，有理由相信，隨泥掘處羅可汗的數千騎也應該是原先泥利可汗、失咄弓彌設等東突厥的部眾。換言之，大業七年降隋的西突厥，即是開皇十三年以來從東突厥逃往西突厥的部落。<sup>72</sup>

### 三、史大奈入居中原後的仕宦生活

達漫、史大奈等人歸附隋廷後，西突厥國人改立都六葉護之子、達頭可汗之孫為國君，建號射匱可汗。<sup>73</sup>達漫與史大奈曾隨煬帝從征高麗，達漫被煬帝重新賜號為曷薩那可汗，<sup>74</sup>並妻以宗室女

<sup>70</sup> 泥掘處羅可汗之弟，《隋書》，卷67，〈裴矩傳〉記為「闕達度設」，頁1582；同書，卷84，〈北狄傳·西突厥〉記為「達度闕」，頁1879；《舊唐書》，卷55，〈李軌傳〉記為「闕達度闕設」，頁2249；王欽若等編纂，周勳初等校訂，《冊府元龜（校訂本）》，卷977，〈外臣部（二十二）·降附〉記為「建度闕」，頁11310。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上海：上海書店，四部叢刊初編史部，1989），卷8，〈隋紀上〉從《隋書·裴矩傳》，頁7，本文從司馬光說法。

<sup>71</sup> 清·張澍編輯，《西河舊事》（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記載：「澍按，天山一名折羅漫山，見《元和志》，而《括地志》作初羅漫山，或作時羅漫山，皆字形相近而誤。」，頁2。

<sup>72</sup> 有一旁證或可說明降隋者為原先東突厥的部落。《新唐書》，卷215下，〈突厥傳下〉記載：「初，曷薩那朝隋，國人皆不欲；既被留不遣，乃共立達頭孫，號射匱可汗。」，頁6056。可知，西突厥的國人皆未從曷薩那入隋，降隋的數千騎應是與曷薩那一樣，來自於東突厥。

<sup>73</sup> 王溥，《唐會要》，卷94，〈西突厥〉，頁2006。內田吟風，〈西突厥初世史の研究〉，大業六年隋朝勸誘射匱可汗攻擊泥掘處羅可汗後，射匱可汗在很短時間內即獲取勝利，大業七年十二月，泥掘處羅可汗留居隋廷後，射匱可汗在西突厥的大可汗地位正式確立，頁467。

<sup>74</sup> 《隋書》，卷84，〈北狄傳·西突厥〉記為「（泥掘）處羅從征高麗，賜號為曷薩那可汗。」，頁1879；王欽若等編纂，周勳初等校訂，《冊府元龜（校訂本）》，卷974，〈外臣部（十九）·褒異〉記：「（大業）八年，突厥處羅從征高麗，賜號為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頁11274。楊聖敏，〈突厥回紇史中的幾個問題〉，《西域研究》，1993年第3期（烏魯木齊，1993.9），指出「曷娑那」（Hassan, Khazar）在

信義公主，賜以錦綵袍十，其綵萬疋。<sup>75</sup>史大奈以功授予金紫光祿大夫，賞物千段。金紫光祿大夫為從二品散官。<sup>76</sup>所謂「散官」，是相對於「執事官」而言，執事官係掌有實務，散官則為虛號，無實際職務，作為班位、銓敘、俸給、章服制限之用。<sup>77</sup>《隋書·百官志》記載：

高祖又採後周之制，……又有特進左右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並為散官，以加文武官之德聲者，並不理事。……居曹有職務者為執事官，無職務者為散官。<sup>78</sup>

散官之制，漢代已有，宋人岳珂，《愧郊錄》記載：

考漢制，光祿大夫、太中大夫、朝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數十人。特進、奉朝請，亦皆無職守，優游祿秩，則官之有散，自漢已有之矣。<sup>79</sup>

散官又稱「散位」，凡九品以上職事所帶散位，謂之「本品」；凡無職事官者所帶散位，謂之「散品」。散官三品以上者，可給俸祿、預朝會。<sup>80</sup>金紫光祿大夫是不掌理實際職務的從二品散官，屬加官性質。

其後，煬帝以史大奈率所部處之於隋北境的樓煩郡。<sup>81</sup>案：樓

突厥語中，意為「游蕩」或「放牧」，頁66。煬帝賜重新賜號達漫為曷娑那可汗，意指留居隋朝境內的西突厥牧主。又，煬帝賜號達漫，《隋書·西突厥傳》、《通典·邊防十三·突厥下》、《冊府元龜》、兩《唐書·突厥傳下》皆記為「曷薩那」；《通鑑》記為「曷娑那」，今從《隋書》。

<sup>75</sup> 《隋書》，卷84，〈北狄傳·西突厥〉，頁1879；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校訂本）》，卷978，〈外臣部（二十三）·和親〉，頁11324。

<sup>76</sup> 《隋書》，卷28，〈百官志下〉，頁785。

<sup>77</sup> 岑仲勉，〈依唐代官制說明張曲江集附錄誥命的錯誤〉，《金石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462。

<sup>78</sup> 《隋書》，卷28，〈百官志下〉，頁781。

<sup>79</sup> 南宋·岳珂，《愧郊錄》，《四部叢刊》（上海：上海書店，1984），「子部」第五十四冊，卷7，〈散階勳官寄祿功臣檢校試銜〉，頁11。

<sup>80</sup> 張國剛，《唐代官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頁164。

<sup>81</sup>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81，〈隋紀五〉，煬帝大業大業八年正月條，頁5658。游自勇、趙洋，〈敦煌寫本S.2078V「史大奈碑」習字之研究〉，指出隋煬帝分史大奈部落於樓煩郡，兩《唐書》均繫在從征高麗之後，以第一次征高麗結束於大業八

煩郡，煬帝大業四年（608）置，《隋書·煬帝紀》記載：

（大業四年三月）乙丑（二十二日），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夏四月丙午（初四），以離石之汾源、臨泉，雁門之秀容為樓煩郡，起汾陽宮。<sup>82</sup>

同書，〈地理志〉記載：

樓煩郡，大業四年置。統縣三，戶二萬四千四百二十七。靜樂，舊曰岢嵐。開皇十八年改為汾源，大業四年改焉。有長城。有汾陽宮。有關官。有管涔山（筆者案：又名燕京山）、天池、汾水。臨泉，後齊置，曰蔚汾。大業四年改焉。秀容，舊置肆州，後齊又置平寇縣。後周州徙雁門。開皇初置新興郡、銅川縣。郡尋廢。十年廢平寇縣。十八年置忻州，大業初州廢，又廢銅州。有程侯山、繫舟山。有嵐水。<sup>83</sup>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嵐州》記載：

嵐州，……隋大業四年，於靜樂縣界置樓煩郡，因漢樓煩縣為名。<sup>84</sup>

前已指出，泥利可汗因私連大義公主事被揭發，叛離東突厥轉而依附西突厥達頭可汗，達漫被擁立為西突厥大可汗後，東突厥與之敵對仇視，兩國交兵不已，如今煬帝收容達漫，妻以宗室女，重新賜新可汗名號，又以史大奈部眾處之於靠近東突厥南境的樓煩郡，此舉不無監控東突厥之意，東突厥始畢可汗不滿煬帝舉措，使東突厥與隋朝關係破裂，甚至引發大業十一年（615）的

---

年七月算，居樓煩郡不當如《通鑑》繫於大業八年正月，頁175。

<sup>82</sup> 《隋書》，卷3，〈煬帝紀上〉，頁71。此段斷句與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不同。

<sup>83</sup> 《隋書》，卷30，〈地理志中〉，頁853-854。

<sup>84</sup>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14，〈河東道三·嵐州〉，頁395。

「雁門事變」。<sup>85</sup>

值得注意的是，碑文云：「(大業)十二年，詔率所部，屯次晉陽，糾合舊部」，雁門事變後，史大奈率部從樓煩郡移鎮至太原晉陽，而就在同一時間，李淵也正擔任太原道安撫大使。<sup>86</sup>學者已指出，李淵早在大業十一年擔任河東討捕使時，已萌發起義之志，擔任太原留守期間，開始積極結納人才，<sup>87</sup>李淵在晉陽期間於公(兩人同在晉陽共事)於私(李淵廣結人才)都會與史大奈往來。以往學界探討李唐與東突厥的關係，多認為是開始於李淵晉陽起兵前夕，派遣大將軍府司馬劉文靜出使東突厥向始畢可汗請兵，以尋求東突厥的支持及助兵馬。史籍中無論是溫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亦或是兩《唐書》、《資治通鑑》、《唐會要》等，也皆言李淵任太原留守，才與東突厥有所接觸，然而我們從近年新出墓誌可知早在隋煬帝大業中晚期，李淵已與東突厥有很深的關係。「阿史那摸末墓誌」記載：

公諱摸末，……曾祖阿波設，祖啟民可汗，父啜羅可汗。……夫人李氏，平夷縣主。<sup>88</sup>

<sup>85</sup> 煬帝大業初期與東突厥啟民可汗、始畢可汗關係緊密，東突厥侍隋恭謹，然而大業六年以後，兩國關係改變，甚至大業十一年(615)八月，始畢可汗率數十萬大軍圍困煬帝於雁門。隋與東突厥關係改變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隋煬帝招納泥厥處羅可汗，可參看朱振宏，〈大業十一年(615)「雁門事變」探微〉，《東吳歷史學報》，24(臺北，2010.12)，頁51-107。游自勇、趙洋，〈敦煌寫本S.2078V「史大奈碑」習字之研究〉，指出雁門之圍發生時，隋煬帝召天下勤王，史大奈所部離雁門最近，推測史大奈參與解除雁門之圍的勤王之役，頁176。筆者則認為，現存文獻史料及史大奈碑皆未記載史大奈曾參與雁門之圍的勤王之役，特別是史大奈碑屬政治景觀性質的神道碑(詳後文)，特重死者生前功業，若是史大奈確曾參與雁門之圍，有救駕之功，史大奈碑應該會有所呈現。因此，我們認為雁門事變時，史大奈可能沒有出兵解圍。

<sup>86</sup> 唐·溫大雅撰，李季平、李錫厚點校，《大唐創業起居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卷1，頁1。

<sup>87</sup> 李樹桐，〈李唐太原起義考實〉，《唐史考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頁1-42；李季平，〈溫大雅與《大唐創業起居注》〉，《古史探微》(濟南：齊魯書社，2003)，頁211-212。

<sup>88</sup>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第三輯，〈故右屯衛將軍阿史那公(摸末)墓誌之銘〉，頁345；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貞觀066」，頁47。

摸末子「阿史那施墓誌」對於平夷縣主有更詳細的記載：

君諱施，字勿施。……父摸末，單于郁射設，即處邏可汗嫡子也。……太宗勅書慰問曰：「突厥郁射設，可怜公主，是朕親舊，情同一家，隨日初婚之時，在朕家內成禮，朕亦親見，追憶此事，無時暫忘。」<sup>89</sup>

李氏身分不詳，不過，從她與李唐同姓，以及太宗勅書所云「是朕親舊，情同一家」、「在朕家內成禮」以及李氏被封為「平夷縣主」，推測李氏可能與唐太宗一家是宗親關係。<sup>90</sup>除了摸末妻李淵宗室女，摸末父親處羅可汗奚純在任東突厥大可汗前，亦被隋廷賜婚李夫人，<sup>91</sup>據「阿史那施墓誌」、「阿史那哲墓誌」誌文中記載太宗勅書「隨日初婚之時」，推測阿史那摸末與李氏成婚時間當是在隋煬帝大業末或恭帝義寧年間，從太宗追記摸末與李氏成婚，加上處羅可汗在李唐討擊中原各割據勢力時，曾出兵助平宋金剛、劉武周等，<sup>92</sup>可知早在隋末東突厥始畢可汗時代，李淵家族即與奚純、摸末家族已有很深的關係。<sup>93</sup>從〔附表三〕可知，奚純與史大奈兩人為從兄弟關係，連繫史大奈碑記載大業十二年史大奈屯次晉陽一事，我們甚至不能排除大業末年李淵在晉陽擔任太原

<sup>89</sup> 毛漢光撰，耿慧玲助理，《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7），第十七冊，「1700阿史那施誌」，頁489；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第二輯，「大唐故右屯衛翊府右郎將阿史那勿施墓誌并序」，頁455。又，阿史那摸末之孫「阿史那哲墓誌」亦有相同記載，可參看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第五輯，〈大唐故□武將軍行左驍衛翊府中郎將阿史那哲墓誌并序〉，頁338。

<sup>90</sup> 《舊唐書》，卷43，〈職官志二〉記載：「王之女，封縣主，視正二品。」，頁1821。可見李氏很可能是李唐的宗室女。

<sup>91</sup> 「大唐故右屯衛翊府右郎將阿史那勿施墓誌并序」記載：「祖奚純，單于處邏可汗，隨拜左光祿大夫，賜婚李夫人，正二品。」。李夫人身分不詳，也可能與李淵有宗室關係。

<sup>92</sup> 「大唐故右屯衛翊府右郎將阿史那勿施墓誌并序」記載：「大唐運開，龍飛晉野，太上破宋金剛，處邏可汗遣弟步利設帥師來與官軍會。其後，處邏可汗率兵馬助起義，至并州，留兵助鎮而去。」，頁338；又可參看《舊唐書》，卷55，〈劉武周傳〉，頁2253-2254；《新唐書》，卷86，〈劉武周傳〉，頁3712-3713。

<sup>93</sup> 朱振宏，〈阿史那自奴（哲）墓誌箋證考釋〉，《成大歷史學報》，44（臺南，2013.6），頁43-108。

留守期間與奚純、摸末的連姻交往，很可能就是史大奈居中牽線的結果。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617）七月癸丑（初五），李淵於晉陽宮仗白旗誓師起兵，<sup>94</sup>就在李淵起兵的同一天，史大奈也率眾歸附李淵。<sup>95</sup>其後，史大奈與柴紹聯兵於飲馬泉，大破隋將桑顯和軍，以功拜正二品散官的光祿大夫。大業十三年十一月丙辰（初九），史大奈隨李淵進軍京師長安，<sup>96</sup>史載「及平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賜姓史氏」，<sup>97</sup>大奈被賜史姓的時間應該就是在平定京師後不久，這是目前已知最早歸附李淵集團以及被賜姓史氏的突厥人，此後突厥族降附歸唐，多依史大奈賜姓之例，改稱史氏。<sup>98</sup>碑文云：「於時九服未清，四郊多壘，兵戈日用，烽燧不息。公每筮神麾，驟參皇駕，東西龕定，匪遑晏處」，李淵代隋建唐後，史大奈一直跟隨秦王李世民討平中原各割據政權，武德元年（618）十一月破薛舉，<sup>99</sup>拜上柱國，封康國公。依據「史善應墓誌」、「史崇禮墓誌」的內容，結合《隋書》的記載，推測林寶，《元和姓纂·河南史氏》所記「入隋，封康國公。」，所指的康國公應是史善應父親東突厥褥但（檀）特勤阿史那實。<sup>100</sup>游自勇教授認為史大奈碑明確記載他於武德元年被封為康國公，因此，《元和姓纂》中「入隋封康國公」也可能存在錯簡，此處康國公是史大奈的可能性更大，畢竟〈河南史氏〉條並未提到阿史那實，史大奈又是目前所知最早被賜「史」姓的突厥人，〈河南史氏〉條要追根溯源，史大奈本當是最重要的一環。<sup>101</sup>筆者認為，雖然史大奈被封為康

<sup>94</sup> 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2，頁18。

<sup>95</sup> 《舊唐書》，卷194下，〈突厥傳下〉，頁5180；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84，〈隋紀八〉，恭帝義寧元年七月癸丑條，頁5742。

<sup>96</sup> 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2，頁37。

<sup>97</sup> 《舊唐書》，卷194下，〈突厥傳下〉，頁5180。又可參看《新唐書》，卷110，〈諸夷蕃將傳·史大奈〉，頁4111。

<sup>98</sup> 史大奈被賜姓史氏之後不久，達漫、史善應等人也於次年歸附唐廷，推測達漫、善應等人入長安時，李淵極可能比照大奈賜姓之例，也給他們改姓史。參看朱振宏，〈新見兩方突厥族史氏家族墓誌研究〉，頁207。

<sup>99</sup> 《舊唐書》，卷194下，〈突厥傳下〉，頁5180。

<sup>100</sup> 朱振宏，〈新見兩方突厥族史氏家族墓誌研究〉，頁209。

<sup>101</sup> 游自勇、趙洋，〈敦煌寫本S.2078V「史大奈碑」習字之研究〉，頁173-174。

國公，但是，《元和姓纂·河南史氏》所記的「康國公」仍應是阿史那實，所持理由有二：一是，縱然現今所見《元和姓纂》存在著訛謬、考稽失實、世代顛倒等問題，然如同本習字文，雖文字多有重復之處，一般是會遵循範本的文字順序，同樣的《元和姓纂》的編纂也應是按時間先後順序。〈河南史氏〉明確記載「入隋，封康國公」，故此處康國公仍應從隋朝查考為宜。有隋一代，入隋突厥族中被封為康國公者只有褥但（檀）特勤阿史那實一人。二是，〈河南史氏〉開頭「本姓阿史那，突厥科羅次汗子，生蘇尼失。」，內容有錯漏，完整的句子應是「攝圖本姓阿史那，突厥科羅汗次子，生蘇尼失。生實，入隋封康國公。」。《元和姓纂》以沙鉢略可汗攝圖做為敘述入居中原突厥的首句，是因為東突厥汗國自沙鉢略可汗才臣屬於隋，建立君臣關係，<sup>102</sup>而阿史那實、蘇尼失、攝圖皆屬科羅一系，符合編纂的文脈。若上述說法不誤，我們要進一步追問，為何〈河南史氏〉在阿史那實之後，不再接敘講述阿史那實之子善應，而是「生大奈，子仁表，駙馬。」，推測原因為史大奈是李唐起兵建國以來第一位歸附的突厥族，故進入唐朝以後，林寶的編纂改以史大奈世系做為排序，而史大奈之所以被封為康國公，也是因襲隋朝故事，阿史那實是第一位隋朝時代入居中原的突厥族，隋文帝封為康國公，做為第一位歸附唐朝的突厥族，唐高祖亦將史大奈封為康國公。

武德三年（620），史大奈被冊授右翊衛將軍。《唐六典·左右衛》記載：

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隋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候、左、右武侯、左、右領軍、左、右率府各有大將軍一人，所謂十二衛大將軍也。……至開皇末年，罷十二衛大將軍員。煬帝大業三年，復置左、右衛為左、右翊衛，其所領名為驍騎。皇朝復左、右衛府，官屬與《隋令》同。……將軍各二人，從三品。……。

<sup>102</sup> 朱振宏，〈新見兩方突厥族史氏家族墓誌研究〉，頁208-209。

左、右衛大將軍，將軍之職，掌統領宮廷警衛之法，以督其屬之隊杖，而總諸曹之職務。<sup>103</sup>

左·右翊衛，隋文帝開皇年間稱為左·右衛，開皇末年罷廢。煬帝大業三年復置，改曰左·右翊衛，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又改左·右翊衛為左·衛府，<sup>104</sup>是十六衛之首。右翊衛將軍為從三品武職事官，負責「掌宮禁宿衛之事」。皇帝御正殿時，「則守諸門及內廂宿衛仗。」<sup>105</sup>這是史大奈進入中原後所擔任的第一個職事官。唐廷冊授史大奈右翊衛將軍的確切時間無明載，我們推測可能是在武德三年六月丙午（十五日），與唐破宋金剛、劉武周，收復并州有關。<sup>106</sup>武德四年（621）五月，史大奈又從李世民先後擒獲竇建德、平滅王世充。<sup>107</sup>史大奈長期跟隨李世民征戰，可謂秦王府集團重要的成員之一。<sup>108</sup>武德六年（623）正月，史大奈隨太子李建成敗劉黑闥，<sup>109</sup>是時，秦王與太子政治鬥爭正處於白熱

<sup>103</sup>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24，〈左右衛〉，頁615-616。

<sup>104</sup> 《新唐書》，卷39上，〈百官志四上·十六衛〉，頁1279。

<sup>105</sup> 《新唐書》，卷39上，〈百官志四上·十六衛〉，頁1279。

<sup>106</sup> 《舊唐書》，卷1，〈高祖紀〉記載：「（武德三年四月）甲寅（二十一日），加秦王益州道行臺尚書令。秦王大破宋金剛於介州，金剛與劉武周俱奔突厥，遂平并州。……（六月）丙午（十五日），親錄囚徒。封皇子元景為趙王，元昌為魯王，元亨為鄴王；皇孫承宗為太原王，承道為安陸王，承乾為恒山王，恪為長沙王，泰為宜都王。」，頁10-11；《新唐書》，卷1，〈高祖紀〉記載：「（武德三年四月）秦王世民及宋金剛戰于雀鼠谷，敗之。……壬戌（二十九日），秦王世民及劉武周戰于洺州，敗之，武周亡入于突厥。克并州。……（六月）丙午，慮囚。封子元景為趙王，元昌魯王，元亨鄴王。」，頁10-11。唐廷破宋金剛與劉武周，收復并州之後，大封諸皇子、皇孫的同時，也冊授史大奈右翊衛將軍。另一位突厥族史善應也被冊授為左翊衛驃騎將軍（正四品下武職事官）。

<sup>107</sup>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89，〈唐紀五〉，高祖武德四年五月條，頁5913-5916。

<sup>108</sup> 游自勇、趙洋，〈敦煌寫本S.2078V「史大奈碑」習字之研究〉，頁177。

<sup>109</sup> 關於劉黑闥被李建成擒獲斬殺時間，史籍文獻有不同的記載：《舊唐書》，卷1，〈高祖紀〉記：「（武德五年十二月）皇太子破劉黑闥於魏州，斬之，山東平。」，頁13；同書，卷55，〈劉黑闥傳〉記：「（武德）六年二月，又大破之于館陶，黑闥引軍北走。……黑闥乃進至城傍，（諸葛）德威勒兵執之，送于建成，斬於洺州，山東復定。」，頁2260。《新唐書》，卷1，〈高祖紀〉載：「（武德六年）二月，劉黑闥伏誅。」，頁15；同書，卷86，〈劉黑闥傳〉載：「明年（筆者案：武德六年）正月，黑闥所署總管崔元遜迎拜，延之入。……車騎諸葛德威勒兵前，黑闥罵曰：『狗輩負我！』遂執詣皇太子所斬之。」，頁3717。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化階段，李建成率兵討擊劉黑闥即是爲了建立軍功以做爲與李世民抗衡的籌碼。史大奈參與此次征討戰役，也顯示出李建成積極拉攏秦王府重要軍事將領的企圖。

太宗貞觀三年（629），累遷升爲右武衛大將軍。《唐六典·左右衛》記載：

左、右武衛，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左、右武衛大將軍，將軍之職掌如左、右衛。其異者，大朝會率其屬被白質鍪、甲、鎧，執白弓箭、白楯、白贊，建鷲麾、四色麾、五牛旗、飛麟旗、駃騠旗、鷲旗、犀牛旗、駿驕旗、驪蜀旗。蹕稱長唱警，持鈸隊應蹕，爲左、右廂儀仗。凡翊府翊衛、外府熊渠番上，則分配之。在正殿前，則以諸隊次立於驍衛下；在嘉德門內，則以挾門隊坐於東、西廊。<sup>110</sup>

史大奈從原先的從三品右翊衛將軍，升遷至正三品的右武衛大將軍，此與貞觀三年十二月庚寅（二十四日）東突厥郁（奧）射設阿史那摸末、蔭奈特勤等部歸附唐廷有關。<sup>111</sup>貞觀四年（630）三月，唐擒獲頡利可汗，平滅東突厥，大量突厥部落降附，唐廷除設置北開、北寧、北撫、北安、順、祐、化、長等羈縻州外，同年五月，又權置豐州都督府以領突厥降戶，<sup>112</sup>史大奈以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sup>113</sup>唐代前期「檢校官」有代理之意，<sup>114</sup>檢校

190，〈唐紀六〉，高祖武德六年正月己卯條云：「春，正月，己卯，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頁5964。今從《通鑑》。

<sup>110</sup> 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24，〈左右武衛〉，頁620。

<sup>111</sup> 《舊唐書》，卷61，〈竇靜傳〉，頁2369、同書，卷194上，〈突厥傳上〉，頁5159；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93，〈唐紀九〉，太宗貞觀三年十二月庚寅條，頁6066；杜佑撰，王文錦、王永興、劉俊文、徐庭雲、謝方點校，《通典》，卷197，〈邊防十三·突厥上〉，頁5411。阿史那摸末降附後，太宗冊授摸末上大將軍（視正三品勳官），不久再遷摸末為右屯衛將軍（從三品武職事官）。參看朱振宏，〈阿史那自奴（哲）墓誌箋證考釋〉，頁73-75。

<sup>112</sup> 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4，〈關內道·豐州〉，頁112。

<sup>113</sup> 《元和郡縣圖志》記「以史大奈為都督」；《資治通鑑》記：「以右武衛大將軍史大奈為豐州都督」；《通典》與兩《唐書·突厥傳》咸記為「檢校豐州都督」。今從《通典》、兩《唐書》。

某官雖非正拜該官，但仍能執行該官之職權，<sup>115</sup>亦即「監臨」。<sup>116</sup>史大奈是以右武衛大將軍職事官兼理豐州都督一職，大奈並由康國公改封為竇國公。唐代前期官品有「貴」（三品以上）、「通貴」（五品以上）之分，史大奈生前為右武衛大將軍，屬於高層的官員。

#### 四、史大奈卒逝時間與歸葬地

關於史大奈的卒逝時間，《通典》與《舊唐書》記為貞觀十二年；<sup>117</sup>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記為貞觀十一年（637）。<sup>118</sup>游自勇教授認為唐代豐州的廢置時間，兩《唐書·地理志》均繫於貞觀十一年，《元和郡縣圖志》將豐州的廢府與史大奈的去世聯繫起來，未必無據，因此認定史大奈應是卒於貞觀十一年，十二年是葬年，《舊唐書·突厥傳》誤將葬年作卒年。<sup>119</sup>筆者則認為《舊唐書》所記無誤，史大奈的卒年與葬年都是在貞觀十二年，所據理由有三：第一，現今點校本《舊唐書·豐州》在記載「（貞觀）十一年廢」後的校勘記有云：「『十』上各本原有『二』字，據《元

<sup>114</sup> 杜佑撰，王文錦、王永興、劉俊文、徐庭雲、謝方點校，《通典》，卷19，〈職官典一·歷代官制總序〉記載：「檢校者，云檢校某官。……皆是詔除，而非正命。」，頁472。賴瑞和，〈論唐代的檢校官制〉，《漢學研究》，第24卷第1期（臺北，2006.6），唐代文獻中，「檢校」一詞的用法和含意有：一是，「檢校」當普通動詞來使用，意思是「負責」、「管理」、「辦理」之意；二是，「檢校」是官制用語，指某一種「檢校官」。在唐前期，「檢校官」是代理某某職務的官員，任檢校官者，常帶有一個「本官」，再去代理（代行）另一種官的職務；安史亂後，「檢校官」變成一種虛銜，無實職，中晚唐更成了經常授給使府方鎮文武長官和幕僚的加官，獎軍功或用以提升幕佐的地位，頁187-190。

<sup>115</sup> 王壽南，〈唐代文官任用制度之研究〉，《唐代政治史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頁32。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6），〈凡例〉指出：自唐初至肅宗世，凡檢校官，皆掌本職，與正員不異，頁1。

<sup>116</sup> 唐·長孫無忌撰，劉俊文箋解，《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2，〈名例·無官犯罪〉記載：「檢校、攝判之處，即是監臨。」（頁175）。

<sup>117</sup> 杜佑撰，王文錦、王永興、劉俊文、徐庭雲、謝方點校，《通典》，卷199，〈邊防典十五·北狄六·突厥下〉，頁5455；《舊唐書》，卷194下，〈突厥傳下〉，頁5180。

<sup>118</sup> 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4，〈關內道·豐州〉，頁112。

<sup>119</sup> 游自勇、趙洋，〈敦煌寫本S.2078V「史大奈碑」習字之研究〉，頁177。

和志》卷四、《寰宇記》卷三九、《新志》刪。」。<sup>120</sup>由此可知，《舊唐書·豐州》在廢置的時間勘刻上原本就與《元和志》不同，而宋人所編纂的《新唐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恐是直接援引《元和志》的說法。今《舊唐書》點校本據《元和志》、《寰宇記》、《新志》而刪改原刻本的時間，或容有商榷處。因此，僅從豐州的廢置時間判斷史大奈的卒年，不無疑義。第二，現今傳世文獻中最早記載史大奈卒年是杜佑的《通典》，<sup>121</sup>而《通典》明確記載史大奈卒於貞觀十二年。第三，雖然史大奈碑文僅有葬年沒有提到卒年，但從隋唐時期書寫墓誌的常例，若卒逝與下葬時間都是在同一年，一般寫作某年卒於某處，以其年葬於某處。茲舉數例以明之（引文底線由筆者所加）：

「阿史那伽那墓誌」：

以大唐咸亨二年（671）八月十八日終於洛陽道術里第，以其年十一月廿七日葬於長安城西昆明池北馬祖原。<sup>122</sup>

「李思摩墓誌」：

以貞觀廿一年（647）歲次丁未三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遘疾卒于居德里第，春秋六十有五。即以其年四月丁巳朔廿八日甲申窆於昭陵。<sup>123</sup>

「阿史那婆羅門墓誌」：

以永徽二年（651）五月廿七日遘疾卒官。有詔哀傷，追崇禮祿，贈使持節那州諸軍事，那州刺史。以六月廿日，葬

<sup>120</sup> 《舊唐書》，卷38，〈地理志一〉，校勘記〔五七〕，頁1462。

<sup>121</sup> 傳世文獻明確記載史大奈卒逝時間有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以及《舊唐書》。《通典》完成於唐代宗大曆元年（766）；《元和郡縣圖志》成書於唐憲宗元和八年（813）；《舊唐書》修史成於後晉出帝開運二年（945）。以成書先後而論，《通典》最早完成。

<sup>122</sup> 西安市長安博物館編，《長安新出墓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大唐故忠武將軍行左武德郎將阿史那伽那墓誌銘并序〉，頁98-99。

<sup>123</sup> 張沛編著，《昭陵碑石》（咸陽：三秦出版社，1993），〈大唐故右武衛大將軍贈兵部尚書謚曰順李君墓誌銘并序〉，頁113。

于灞原。<sup>124</sup>

「契苾李中郎墓誌」：

天寶三載（744）九月廿二日，遘疾終於蒿街。聖恩軫悼，贈右領軍衛大將軍。以其載十一月七日，安厝於長樂原。<sup>125</sup>

設若卒逝與下葬的時間不在同一年，一般會明確書寫卒逝與下葬各自的年月日期。例如：

「阿史那哲墓誌」：

以開元十年（722）十月廿六日，於河南府當上宿衛終卒，春秋六十有九。以開元十一年（723）十月十七日，葬於京延興門外五里龍首之原。<sup>126</sup>

「阿史那感德墓誌」：

以天授二年（691）正月十八日，遘疾薨於從政里之私第，春秋廿有七。……以天授三年（692）歲次壬辰朔卅日景申，歸厝於神都城南畢圭鄉。<sup>127</sup>

「執失善光墓誌」：

以開元十年七月廿一日薨于洛陽私第。……開元十一年二月十三日陪窆于昭陵，禮也。<sup>128</sup>

史大奈碑文云：「粵以其年歲次戊戌十一月乙巳朔四日戊申，葬於

<sup>124</sup> 趙力光等編著，《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匯編》（北京：線裝書局，2007），「023 阿史那婆羅門墓誌」，頁77。

<sup>125</sup>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五輯，〈故九姓突厥契苾李中郎贈右領軍衛大將軍墓誌文〉，頁375。

<sup>126</sup>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五輯，〈大唐故右屯衛郎將阿史那婆羅門墓誌銘并序〉，頁338。

<sup>127</sup>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第八輯，〈大周故冠軍大將軍行右鷹揚衛將軍·歸義可汗阿史那府君墓誌銘并序〉，頁302-304。

<sup>128</sup> 張沛編著，《昭陵碑石》，〈大唐故右監門衛將軍·上柱國·朔方郡開國公兼尚食內供奉執失府君墓誌銘并序〉，頁215-216。

醴泉縣神跡鄉」，我們從隋唐墓誌書寫的慣例而論，史大奈的卒逝應該與下葬是在同一年，也就是貞觀十二年。貞觀十二年十一月四日，西曆638年12月14日。

史大奈過世後，以「功臣大將軍」之名，陪葬於唐太宗的昭陵。<sup>129</sup>案：昭陵，位於唐京兆府醴泉縣西北六十里九峻山，<sup>130</sup>始營建於貞觀十一年二月丁巳（二日），<sup>131</sup>貞觀二十三年（649）五月己巳（二十六日），太宗崩逝，同年八月庚寅（十八日），葬於昭陵。<sup>132</sup>當時陪陵臣工皆樹有神道碑石，本篇習字從殘存七百餘字多記事功，較少涉及史大奈治理地方政績，而文中又提到陪衛昭陵，推測可能就是史大奈的神道碑文。<sup>133</sup>明人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墓碑文》有云：

按古者葬有豐碑，以木為之，樹於槨之前後，穿其中為鹿盧而貫緯以窆者也。……漢以來始刻死者功業於其上，稍改用石，……晉宋間始稱神道碑，蓋堪輿家以東南為神道，碑立其地，因名焉。……蓋葬者既為誌以藏諸幽，又為碑碣表以揭於外，皆孝子慈孫不忍蔽先德之心也。<sup>134</sup>

是以，神道碑之名始自魏晉時期，以石刻載死者生前功業樹於墓

<sup>129</sup> 北宋·宋敏求撰，閻琦、李福標、姚敏杰校點，《長安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卷16，〈縣六·醴泉〉，頁309。有關陪葬昭陵的人數，《唐會要》記妃七人、王七人、公主十八人、宰相十二人、丞郎三品以下五十人、功臣大將軍五十七人；《長安志》記載諸王七、公主二十一、宰相一十三、丞郎三品五十三、功臣大將軍以下六十四。清·畢沅撰，張沛校點，《關中勝蹟圖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卷8，〈西安府〉，指出《長安志》載昭陵陪葬名位，本據《陵廟記圖》所載，差舛頗多，陪葬名位當以《會要》為本而證之史傳及《文獻通考》等書，頁303-304。畢沅對昭陵陪位人數有較為清楚的疏理。

<sup>130</sup> 《新唐書》，卷37，〈地理志一·京兆府〉，頁963；宋敏求撰，閻琦、李福標、姚敏杰校點，《長安志》，卷16，〈縣六·醴泉〉，頁307。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4，〈關內道·醴泉縣〉則記載：「太宗昭陵，在縣東北二十五里九峻山。」，頁8。

<sup>131</sup> 《舊唐書》，卷3，〈太宗紀下〉，頁46-47。

<sup>132</sup> 《舊唐書》，卷3，〈太宗紀下〉，頁62。

<sup>133</sup> 游自勇、趙洋，〈敦煌寫本S.2078V「史大奈碑」習字之研究〉，頁177。

<sup>134</sup> 明·徐師曾著，羅根澤校點，《文體明辨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墓碑文〉，頁150。

前，具有強烈公開昭示性質。神道碑屬碑誌類的一種，一般與墓誌撰於同時，在文體上神道碑與墓誌有互文關係，雖然同樣是追敘逝者生平事蹟，但文字表達上兩者有不同側重與分工。從撰者的身分而論，墓誌的作者一般與誌主有親戚、僚佐、同年等較密切的私人關係，而神道碑的作者更多是著作郎、中書舍人或翰林學士等具官方身分，是朝廷對於官員一生功業的臧否，體現出朝廷政治權威的重要象徵之一。<sup>135</sup>按隋唐時期的碑碣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碑（碣），圭首方趺，趺上不過四尺。<sup>136</sup>史大奈生前擔任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是正三品官員，其神道碑應是螭首龜趺。

## 五、結論

史大奈是隋末唐初重要的一位突厥族將領，曾隨從煬帝征伐高麗，又參與李淵起兵及掃平中原割據勢力的重要戰役。《新唐書》的〈諸夷蕃將傳〉，將史大奈列為首位，並贊云：「大奈等事君，皆一其志，無有顧望，用能功績光明，為天子倚信。」<sup>137</sup>然而，對於這樣一位有功於唐的蕃將，傳統史籍文獻對於史大奈的記載並不詳盡，敦煌文書 S.2078V 習字文，重現史大奈神道碑的部分內容，從而讓我們釐清史大奈的出身及其世系，大業十二年屯次晉陽一事，也使我們明瞭何以史大奈最先歸附李淵集團，同時也可以進一步思考李淵與東突厥關係。此外，史大奈曾被唐高祖李淵冊拜上柱國，封康國公；唐太宗李世民也曾授予右翊衛將軍，這也都是以往我們所不知道的內容，凡此皆可補傳統文獻載記之不足，從中我們對史大奈的生平事蹟有了更全面的認識。

（責任編輯：王信杰 校對：王信杰）

<sup>135</sup> 仇鹿鳴，〈權力與觀眾——德政碑所見唐代的中央與地方〉，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十九卷（北京，2013.12），頁81。

<sup>136</sup> 王溥《唐會要》，卷38，〈葬〉，頁809；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4，〈尚書禮部〉，頁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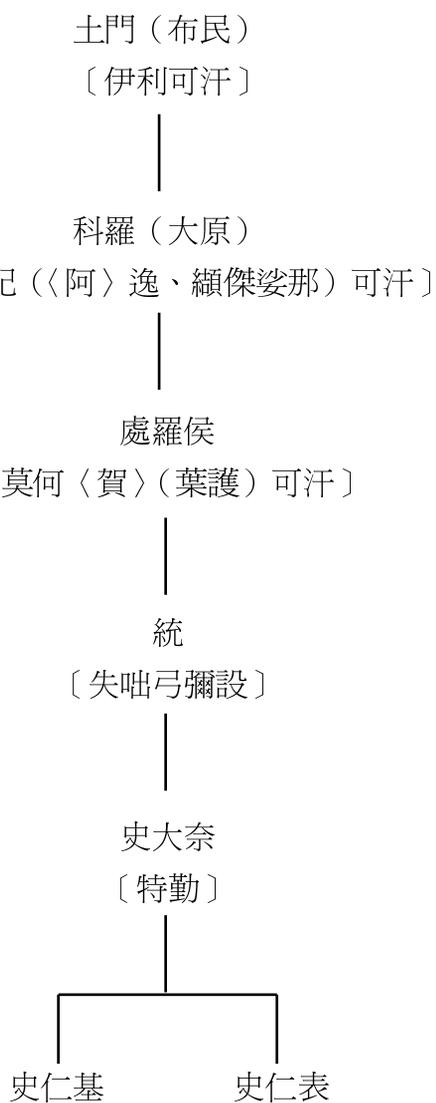
<sup>137</sup> 《新唐書》，卷110，〈諸夷蕃將傳·史大奈〉，頁4130。

〔附表一〕史大奈生平事蹟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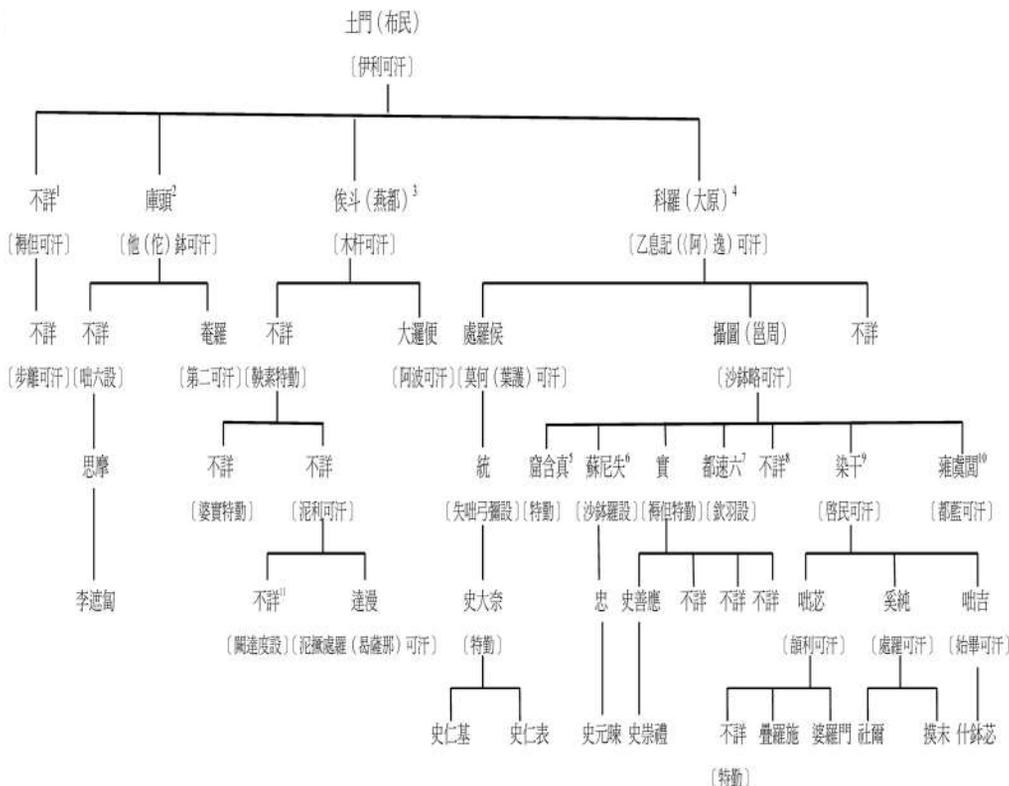
時間	事蹟	備註
大業七年 (611)	十二月己未(八日),以特勤身分與西突厥泥撅處羅可汗(達漫)、闕達度設一同入隋。	西突厥國人改立達頭可汗之孫、都六之子射匱可汗為國君。
大業八年 (612)	1.從煬帝征遼東(高麗),積勞授金紫光祿大夫〔從二品散官〕,賞物千段。 2.將餘眾居樓煩郡。	1.闕達度設將羸弱萬餘人,居會寧郡。 2.泥撅處羅可汗被隋煬帝賜號曷薩那可汗。
大業十二年 (616)	率所部屯兵晉陽。	李淵為太原道安撫大使。
大業十三年 (617)	1.七月癸丑(五日),率眾歸附李淵。 2.八月,與王長諧、劉弘基、陳演壽等人將步騎六千趣梁山。 3.九月,於飲馬泉與柴紹聯兵合擊隋將桑顯和。 4.拜光祿大夫〔正二品散官〕,仍賜器玩,凡所虜獲,即以畀之。 5.十一月,以定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匹),賜姓史氏。	1.李淵為太原留守。 2.七月癸丑,李淵於晉陽起兵。 3.十一月丙辰(初九),李淵攻克長安。
武德元年 (618)	1.十一月,隨秦王李世民破薛舉。 2.拜上柱國〔比正二品勳官〕,封康國公〔從一品爵〕。	1.十二月,達漫、史善應自山東(黎陽)入長安。 2.達漫被封為歸義郡王;史善應拜柱國。
武德三年 (620)	六月丙午(十五日),授右翊衛將軍〔從三品武職事官〕。	四月,秦王大破宋金剛於介州雀鼠谷、敗劉武周於洺州,宋金剛與劉武周俱亡奔東突厥,唐平并州。
武德四年 (621)	五月己未(二日),從秦王李世民與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人生擒竇建德、平王世充。	
武德六年 (623)	二月,從太子李建成平劉黑闥。	

時間	事蹟	備註
貞觀三年 (629)	遷右武衛大將軍〔正三品武職事官〕。	十二月庚寅(二十四日)，東突厥郁(奧)射設阿史那摸末、蔭奈特勤等部歸附唐廷。
貞觀四年 (630)	五月丁丑(十三日)，檢校豐州都督〔從三品文職事官〕，改封爲竇國公〔從一品爵〕，實封三百戶。	1. 三月，東突厥亡國。 2. 豐州都督府不領縣，唯領蕃戶。
貞觀十二年 (638)	1. 卒逝。 2. 十一月戊申(四日)，葬於醴泉縣神迹鄉。	陪葬唐太宗昭陵。
永徽五年 (654)	二月四日，高宗詔贈輔國大將軍〔正二品武散官〕。	
總章元年 (668)	三月六日，高宗詔太原元從、西府舊臣史大奈等人並立爲第一功臣。	

〔附表二〕史大奈世系表



〔附表三〕史大奈家族世系表



<sup>1</sup> 《隋書》，卷 84，《北狄傳·突厥》記載：「佗鉢……又以其弟稱但可汗子為步難可汗，居西方。」（頁 1864-1865）。可知稱但可汗為佗鉢可汗弟。

<sup>2</sup> 《隋書》，卷 84，《北狄傳·突厥》記載：「木杆在位二十年，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頁 1864）；《周書》，卷 33，《楊存傳》記載：「突厥可汗地頭可汗阿史那庫頭目車面」（頁 571）。可知庫頭為木杆可汗弟。

<sup>3</sup> 《隋書》，卷 84，《北狄傳·突厥》記載：「逸可汗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斗，稱為木杆可汗。」（頁 1864）。可知俟斗為逸可汗（乙息記可汗）弟。

<sup>4</sup> 《周書》，卷 50，《興城傳下·突厥》記載：「土門死，子科羅立。科羅號乙息記可汗。」（頁 909）。可知科羅為土門子。

<sup>5</sup> 《隋書》，卷 84，《北狄傳·突厥》記載：「沙鉢略大寧，……因上表曰：『……謹遣第七兒窟含真等奉表以聞。』……」（頁 1869-1870）。

<sup>6</sup> 《舊唐書》，卷 109，《阿史那社利祖蘇尼失傳》記載：「阿史那蘇尼失者，啓民可汗之母弟，社利祖也。」（頁 3290）；《新唐書》，卷 215 上，《突厥傳上》記載：「（蘇）尼失者，啓民可汗弟也。」（頁 6036）案：母弟意指同母之弟，從兩《唐書》的記載可知，染干與蘇尼失為親兄弟關係。

<sup>7</sup> 《隋書》，卷 84，《北狄傳·突厥》記載：「雍虞閭弟都速六娶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喜之。」（頁 1872）。

<sup>8</sup> 《隋書》，卷 84，《北狄傳·突厥》記載：「其眾奉雍虞閭為主，是為額加施多都藍可汗。……其弟欽羽設部落強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頁 1871）。

<sup>9</sup> 有關染干的出身，史籍文獻以及「摸末墓誌」有不同的記載，筆者考訂應當為沙鉢略可汗攝圖之子，詳參朱振宏，《東突厥啓民可汗阿史那染干出身小考》，收入氏著，《隋唐政治、制度與對外關係》（台北：文津出版社，2010），頁 367-3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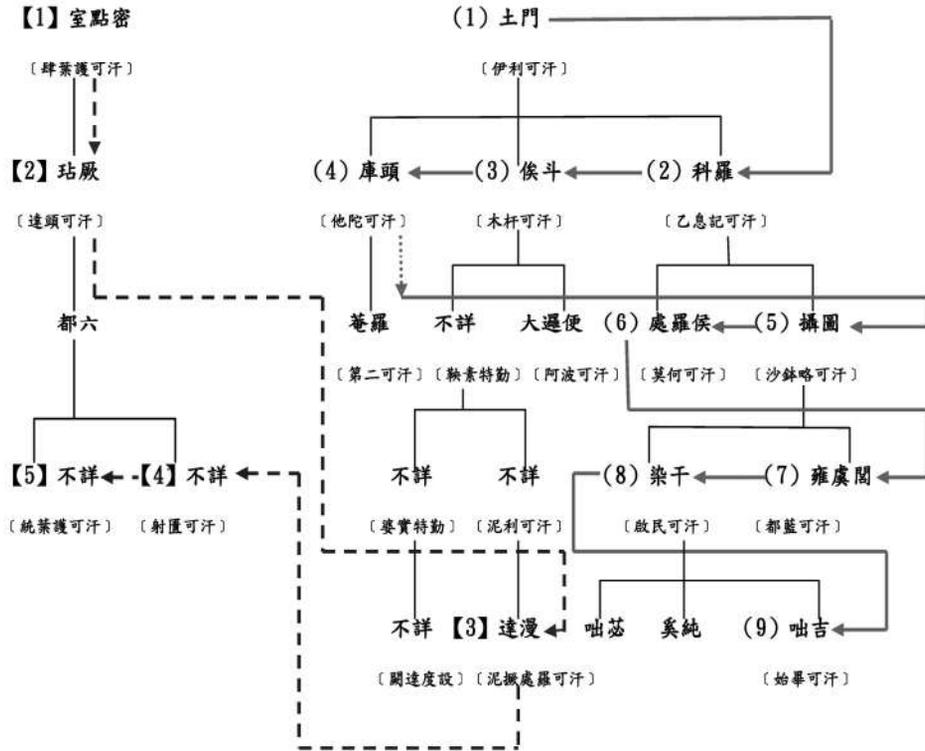
<sup>10</sup> 《隋書》，卷 1，《高祖紀上》記載：「（開皇七年）夏四月……突厥沙鉢略可汗卒，其子雍虞閭立，是為都藍可汗。」（頁 25）。

<sup>11</sup> 王敦等，《開府文苑》，卷 977，《外臣部（二十二）·降附》記載：「唐高祖武德元年七月，闕可汗遣使內附，闕可汗者，西瀛突厥曷婁那可汗之次弟也，初號闐達度設，……及隋亡，自稱闐可汗。」（頁 11310）。

〔附表四〕 東、西突厥自建國至隋末大可汗世系表（552—619）

室點密系（西突厥）

土門系（東突厥）



註： - - - - -> 代表西突厥傳位關係  
 ———> 代表東突厥傳位關係  
 .....> 代表過渡期

## 引用書目

### 一、正史

- 唐·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唐·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北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二、傳統史籍文獻

-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唐·杜佑撰，王文錦、王永興、劉俊文、徐庭雲、謝方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郁賢皓、陶敏整理，孫望審訂，《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唐·長孫無忌撰，劉俊文箋解，《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唐·許敬宗編，羅國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唐·溫大雅撰，李季平、李錫厚點校，《大唐創業起居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北宋·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校訂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  
北宋·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上海：上海書店，四部叢刊初編史部，1989年。  
北宋·宋敏求撰，閻琦、李福標、姚敏杰校點，《長安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  
南宋·岳珂，《愧郟錄》，《四部叢刊》，「子部」第五十四冊，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  
明·徐師曾著，羅根澤校點，《文體明辨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清·高宗敕撰，《續通志》，臺北：新興書局，1963年。

清·張澍編輯，《西河舊事》，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

清·畢沅撰，張沛校點，《關中勝蹟圖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年。

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

### 三、石刻墓誌（敦煌文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第三卷（斯一三八六—二〇八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

毛漢光撰，耿慧玲助理，《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十七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7 年。

西安市長安博物館編，《長安新出墓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年。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二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年。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三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年。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五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年。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八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年。

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郝春文、周尙兵、陳于柱、聶志軍、王曉燕、杜立暉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十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

張沛編著，《昭陵碑石》，咸陽：三秦出版社，1993 年。

趙力光等編著，《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匯編》，北京：線裝書局，2007 年。

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 四、近人專書、譯著

朱振宏，《隋唐政治制度與對外關係》，臺北：文津出版社，2010 年。

朱振宏，《西突厥與隋朝關係史研究（581-617）》，新北：稻鄉出版社，2015 年。

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

岑仲勉，《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

周偉洲，《敕勒與柔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林幹，《突厥與回紇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年。

段連勤，《隋唐時期的薛延陀》，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年。

-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年。
- 張國剛，《唐代官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
- 陳凌，《突厥汗國與歐亞文化交流的考古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劉健明，《隋代政治與對外政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 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6年。
- 路易·巴贊（Louis Bazin）著，耿昇譯，《突厥曆法研究》（*Les Systemes Chronologiques Dans Le Monde Turc Ancien*），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 五、近人論文、譯文
- 仇鹿鳴，〈權力與觀眾——德政碑所見唐代的中央與地方〉，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十九卷（北京，2013.12）。
- 方壯猷，〈匈奴語言考〉，《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2：4（北京，1930.12）。
- 王壽南，〈唐代文官任用制度之研究〉，《唐代政治史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
- 任寶磊，〈新疆地區的突厥遺存與突厥史地研究〉，西安：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未刊本博士論文，2013年。
- 朱振宏，〈大業十一年（615）「雁門事變」探微〉，《東吳歷史學報》，24（臺北，2010.12）。
- 朱振宏，〈阿史那自奴（哲）墓誌箋證考釋〉，《成大歷史學報》，44（臺南，2013.6）。
- 朱振宏，〈新見兩方突厥族史氏家族墓誌研究〉，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八輯（北京，2013.12）。
- 余太山，〈隋與西域諸國關係述考〉，《文史》，69（北京，2004.11）。
- 吳玉貴，〈高昌供食文書中的突厥〉，《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蘭州，1991.3）。
- 岑仲勉，〈依唐代官制說明張曲江集附錄誥命的錯誤〉，《金石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李季平，〈溫大雅與《大唐創業起居注》〉，《古史探微》，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
- 李樹桐，〈李唐太原起義考實〉，《唐史考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
- 辛德勇，〈隋大興城坊考稿〉，《縱心所欲——徜徉于稀見與常見書之間》，北

-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 林恩顯，〈突厥政治社會制度〉，《突厥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
- 林梅村，〈小洪那海突厥可汗陵園調查記〉，《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馬馳，〈鐵勒契苾部的盛衰與遷徙〉，《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第3期（西安，1999.9）。
- 游自勇，〈敦煌寫本「史大奈碑」的復原與考釋〉，宣讀於國立成功大學主辦「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年11月16-17日）。
- 游自勇、趙洋，〈敦煌寫本 S.2078V「史大奈碑」習字之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0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馮永軒，〈「特勒」非誤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編，余婉卉選編，《馮永軒文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
- 楊聖敏，〈突厥回紇史中的幾個問題〉，《西域研究》，1993年第3期（烏魯木齊，1993.9）。
- 趙洋，〈敦煌地區的知識傳播與接受——以「史大奈碑」習字為例〉，宣讀於武漢大學召開「新史料·新史學：武大首屆歷史學博士論壇」（2014年9月13日）。
- 賴瑞和，〈論唐代的檢校官制〉，《漢學研究》，第24卷第1期（臺北，2006.6）。
- 錢伯泉，〈鐵勒國史鉤沉〉，《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蘭州，1992.3）。
- 羅新，〈虞弘墓志所見的柔然官制〉，《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 顧鐵符，〈隋姚辯墓志銘傳本小議〉，《故宮博物院院刊》，52（北京，1991.4）。
- 內田吟風，〈西突厥初世史の研究〉，《北アジア史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
- 白鳥庫吉，〈室韋考〉，《白鳥庫吉全集》，第四卷，「塞外民族史研究（上）」，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
- 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白鳥庫吉全集》，第四卷，「塞外民族史研究（上）」。
- 護雅夫，〈第一編 突厥の国家と社会〉，《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I，東

京：山川出版社，1967年。

伯希和 (Paul Pelliot)，〈中亞史地叢考〉(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Asie central)，沙畹 (Edouard Chavannes) 等著，馮承鈞譯，《大月氏都城考》，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年。

伯希和 (Paul Pelliot) 著，馮承鈞譯，〈吐谷渾爲蒙古語系人種說〉，伯希和等著，馮承鈞譯，《蒙哥》，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年。

沙畹 (Edouard Chavannes) 著，馮承鈞譯，《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 Kiwe Occidentaux*)，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Sanping Chen, "Son of Heaven and Son of God", *Multicultural China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Yu Taishan, "The Sui Dynasty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Sino-Platonic Papers*, No. 247 (2014.4).

#### 六、工具書 (網路)

Clauson, Sir Gerard,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72.

Tâlat Tekin, *Tunyukuk Yazıtı*, Ankara: Simurg, 1994.

國際敦煌項目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網站：<http://idp.bl.uk/>。

## A Study of Shi Da-nai

Chu, Chen-hung\*

### Abstract

Shi Danai was an important Türkish military commander during late Sui and early T'ang Dynasties. He was the first foreign commander to serve on Lee Yuan's army when the latter initiated a mutiny in Taiyuan. He was also the first to adopt the "Shi" surname, and subsequently affected the surname choice of all his Türkish fellowmen in the T'ang Dynasty. Yet, historical records about Shi Danai's life and experiences, especially his attachment to Li Yuan, were scarce and fragmentary. Fortunately, Dunhuang Manuscript S.2078 Verso contains a student writing practice sample which reveals partial content of "Stele for Shi Danai" to allow us exploring Shi Danai's life and achievements more explicitly.

**Key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 S.2078 Verso, Shi Danai, Turk (Türk, GökTürk), Sui and T'ang Dynasties

---

\*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